

ZHU KE FU

朱可夫

张力编著

外国名人传记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朱可夫

张 力 编著

目 录

一、苦难童年.....	1
二、当兵就要当好兵	10
三、参加国内战争	17
四、我们要成为最好的师	21
五、重视坦克的作用	28
六、哈勒欣河初露锋芒	32
七、风暴即将来临	42
八、德军不是不可战胜	51
九、列宁格勒保卫战	65
十、莫斯科大会战	75
十一、斯大林格勒的转折	84
十二、向西挺进	92
十三、进攻柏林.....	102
十四、和平时期的政治挫折.....	109

一、苦难童年

1908年夏天的傍晚，一列火车正行驶在开往莫斯科的途中，天正下着倾盆大雨，车厢内很暗，在三等车厢狭窄的过道里，只有一根蜡烛发出昏黄的光亮，车厢里拥挤不堪，气味简直能让人窒息。在靠窗的一个座位上坐着一位少年，看上去大约只有十一二岁，他一直趴在车窗旁，看着窗外闪过一排排黑色的树影和远处村落里星星点点的灯光。他就是后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功名显赫的苏联元帅——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

这是朱可夫第一次出远门，也是第一次坐火车。而在此之前他连铁路都没见过。他是去莫斯科当学徒，学手艺。坐在他身边的谢尔盖叔叔将把他带到莫斯科，找他的舅舅。临走前朱可夫的父亲反复嘱咐他：“你要忘掉他是你的舅舅。他是你未来的老板。阔老板是不喜欢穷亲戚的。千万千万记住这一点。”

火车驶过巴拉诺夫车站以后，远处突然出现一排灯火通明的高楼。朱可夫好奇地问一位站在车窗旁的老人：“老伯伯，这是莫斯科吗？”

“不，孩子，这不是城市。这是萨瓦·莫罗佐夫开的纳罗—福明斯克纺织厂。我在这个厂工作了15年。”老人紧接着又伤心地说：“现在，我不工作了。”

朱可夫问：“为什么？”

他说：“说来话长……我的妻子和女儿都死在这里。”他的脸色苍白，闭了一会儿眼睛。

他又说道：“每次经过这座该死的工厂，见到这个吞吃了我的亲人的怪物，我无法使自己平静下来……”他猛然离开窗户，走到车厢昏暗的角落里坐下，蒙头吸起烟来。

朱可夫并没听懂老人的话，他睁大眼睛看着窗外这个“吃人的怪物”，他不理解它是怎么吃人的，但他又似乎感觉到点什么，他的前方等待他的将是艰辛和磨难。

朱可夫于 1896 年 12 月 2 日出生于莫斯科西南的卡卢加省斯特烈耳科夫卡村。他的家境贫寒，全家人住在一幢很破旧的房子里，房子的一角已几近坍塌。在这所房子里原来住着一位名叫安努什卡·朱可娃的寡妇，她无儿无女，生活十分凄凉和寂寞。于是，她就从孤儿院领回了一个 2 岁的男孩，没人知道这个孩子的父母是谁。只听说，在孤儿院门口捡到时，这个男孩身上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儿子名叫康斯坦丁。”朱可娃把孩子收养后，取名叫康斯坦丁·安德烈维奇·朱可夫。他就是朱可夫的父亲。

在朱可夫的父亲 8 岁时，养母就去世了。为了维持生计，他独自一人到乌戈德厂村跟一位皮匠学手艺。但因为年幼，在学徒期间主要是干杂活，甚至是替老板带孩子、喂牛，因此当三年“满师”时，他并没学到什么，只好到别的地方找活干。他步行到莫斯科，终于在那里的维义斯制鞋厂找到了工作，并学到了鞋匠的手艺。

在朱可夫的父亲 50 岁时和他的母亲结了婚，当时他的母

亲 35 岁。两人都是第二次结婚，也都是在自己第一次结婚后不久就丧偶的。朱可夫的母亲叫乌斯季妮娅·阿尔捷米耶娜。她也是出生在邻近村庄一个贫穷的人家。

当时正是俄国最黑暗的沙皇时代，卡卢加省的农民生活很苦，贫瘠的土地很难养活一家老小。朱可夫的父亲在莫斯科打工，很少有钱寄回来，莫斯科工人的工资甚至难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直到 1905 年，朱可夫的父亲和许多工人一道因为参加示威游行被工厂开除，回到村子干起了皮匠活和农活，生活才稳定一些。但由于家境的穷困，朱可夫的母亲不得不额外找活干。冬夏或早秋季节，她拼死拼活在地里干，到晚秋时候就到县城，帮人把食品杂货发送给戈德厂的商人。运一趟，只能得到一个卢布到一卢布十戈比，这还要包括马料、店钱、饭钱等等，这甚至比一个乞丐讨到的钱还要少。但为了一家人不被饿死，她毫无怨言地干着。

就在朱可夫 5 岁时，他又有了一个弟弟，这对朱可夫一家来说，更加重了负担。为了养这个瘦弱的孩子，朱可夫的母亲产后几个月，就进城挣钱。几乎所有的街坊邻居都劝她留在家照看孩子，但饥饿威胁着全家人，她不得不去。当年秋天，朱可夫那不到 1 岁的弟弟就死了。

就在同一年朱可夫一家又遭到一件不幸的事，他家那幢破旧的老房子因为年久失修，房顶塌了下来，而且冬天很快就来了。为了能有个屋子过冬，朱可夫的父亲用分期付款的方法买了少量的木料，在周围邻居的帮助下，终于在 11 月份把房子盖好了，但这房子非常简陋，门是用旧板子拼凑起来的，窗户上的玻璃都是破裂的，这只能算作一个栖身之地。朱

可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到 1902 年冬我已经 7 岁。这是我家非常困难的一年。收成不好，粮食只能吃到 12 月中。父母挣的一点钱，买点盐和面包还还债也就光了。亏得邻居帮忙，我们有时才有点稀粥或是白菜汤喝。这样的互相帮助在农村是常有的，这是生活在困苦中的俄罗斯人友爱团结的传统。”

8 岁时，朱可夫进了一所教会小学，成绩一直很优秀。在三年制小学毕业时，朱可夫因为他的学习成绩而获得了一张奖状。在当时，一个受了三年小学教育的人是相当了不起的，全家人都为他而高兴。

朱可夫的父亲对他说：“现在你是有文化的人了，可以带你到莫斯科去学手艺了。”

母亲专门为朱可夫做了一件新衬衣，父亲为他做了一双皮靴。朱可夫知道家里的经济条件需要他外出谋生，以减轻家里的负担。虽然他更希望继续读书，以满足他强烈的求知欲。朱可夫更多地承担了家务劳动，帮母亲干活。他知道，他很快就会离开家，离开家人和朋友们去莫斯科了；他知道，他的童年实际上已结束了，他应该像成人一样去考虑问题，为父母分忧了。

当时，朱可夫想学印刷工，但没有熟人可以介绍进印刷厂。他告诉父母，他什么工作都愿意干，只要对家里有益就可以，他当时并没想太多，只是对独自去莫斯科学艺，时常感到心情紧张，他毕竟还是孩子。

母亲终于决定找她的兄弟米哈伊尔，让朱可夫在他的毛皮作坊学手艺，一来毛皮匠挣钱多，二来好歹是亲戚，能有

个照应。她独自去娘家找她的兄弟，请求他收朱可夫当学徒。

朱可夫的这位舅舅，小时也很苦，从小在毛皮作坊学徒。成了师傅后，靠省吃俭用，拼命干活，白手起家，成为一个出色的毛皮匠兼皮货商人。但当他发财后，却残酷地剥削他的工人，谋取暴利，而且非常吝啬，从不接济朱可夫一家。他看不起朱可夫的父亲，认为他空有一身好手艺，却挣不到钱。经常给人干活不收钱是件极其愚蠢的事。他精明地要求看一下本人，再答应是否收朱可夫为学徒。

朱可夫被父亲带去见这位舅舅，在此之前他从没见过他，米哈伊尔舅舅没有答理朱可夫父亲的问候，也没和他握手，而是盯着朱可夫看了看说：“小伙子！怎么，你想当毛皮匠吗？这个行当不错，但很苦啊！”

“我不怕吃苦。”朱可夫回答道。

“识字吗？”

朱可夫的父亲把他的奖状递过去，米哈伊尔看了一眼说：“好样的！我收下了，你很结实，看来也不笨。我妻弟谢尔盖，过一个星期去莫斯科，让他把你带到我那里吧。”

一星期后，朱可夫和谢尔盖叔叔踏上了去莫斯科的旅途。

莫斯科的一切，对朱可夫来说都是超出想象的。高大的房屋，华丽的商店，肥壮的大马和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和人行道上衣衫褴褛的醉汉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都给少年时期的朱可夫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天，朱可夫就被安排了一个学徒的职责——打扫房间，为大小主人擦鞋，甚至为女主人买菜等等。吃午饭时，朱可夫就因为从菜盆里捞了两块肉吃，脑门上重重地挨了一勺

子，头上立刻鼓起了一个包。这是他到莫斯科不到半天时间的第一次挨打，以后挨打成了家常便饭，不仅要挨老板的打，还要挨师傅、工头和老板娘的打。

作为学徒，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很快地洗完脸，就去收拾工作场地，准备好师傅们工作所需要的一切。晚上等打扫完毕，为第二天作好准备后，要到11点钟才能睡觉。睡觉只能睡在作坊里的地板上；天很冷的时候，才让睡后门过道里的高板床。

朱可夫用心地开始学习手艺。一年后他就顺利地学会了毛皮匠这一行当的初步的手艺。虽然很忙，但朱可夫仍然挤出时间读书。这段时间里，他和老板的大儿子亚历山大关系不错，因为是同岁，亚历山大对朱可夫比对别人要好些，他常常借给朱可夫书看。像长篇小说《护士》、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笔记》和其他许多廉价的惊险小说，这些书都给朱可夫带来很多的乐趣，也提高了他读书的欲望。很快朱可夫就不满足于仅读这些书了，他发现这些书虽然很有趣，但却没有什么教益。他想认真地学些东西。

在亚历山大的帮助下，朱可夫开始进一步学习俄语、数学、地理，并阅读一些通俗科学读物。最初是利用老板不在家的时候和星期日两个人一起学习，但很快老板还是知道了朱可夫在学习，他非但没有惩罚朱可夫，还夸奖了他这样做是件好事。这主要是因为老板对朱可夫的工作很满意。在老板的两个儿子的极力劝说下，老板终于同意让朱可夫去上课程相当于市立中学的文化夜校，但前提条件是不允许影响干活。朱可夫非常高兴，他极力珍惜这一难得的机会，每天干

完活以后，开始学他的功课。厕所里通宵亮着一支 20 支光的电灯，朱可夫每到夜间都爬在小板床上凑近厕所门口，借着那点微弱的灯光学习。

三年后，朱可夫当上了徒工的工头，手下有三名徒工，他也顺利地学完了市立中学的全部课程，而且成绩很好。他已不满足于学习书本上的知识了，他常拾些师傅们读过的报纸看，也向亚历山大借些杂志看。每次老板派朱可夫送货，他就背着皮货走着送去，以节省下几戈比的车费买书看。

到了学徒的第四年，朱可夫被派到乌留皮诺集市批发毛皮，小门面的掌柜叫瓦西里·丹尼洛夫，他是个很残忍、凶狠的人，常常因为一点点小事，就以一种暴虐狂的残忍狠打当时只有 14 岁的朱可夫。一次朱可夫再也忍受不了了，抓起捆包时用的橡木压杠，用尽全身力气照他头上打去，丹尼洛夫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了地上。朱可夫以为把他打死了，很害怕，从店里逃走了。后来听说他只是被打晕了，才回到莫斯科的店里。丹尼洛夫向老板告了状，老板狠狠地打了朱可夫一顿，但朱可夫并不难过，丹尼洛夫也再不敢动他一下了。

1912 年夏天，朱可夫终于得到了他学徒四年来的第一个假期，虽然仅有十天的时间，但朱可夫仍很高兴。他给家里每一个人都买了礼物，还给母亲买了两俄磅糖、半俄磅茶叶和一俄磅糖果，这些都是朱可夫学徒期间节省下的钱买的，最后给了母亲三个卢布，这一切对于当时的人家已是笔不小的财富，另外他给父亲一个卢布作为零花钱。家里人都很高兴，这是朱可夫去莫斯科学徒四年来的第一次见面。

朱可夫发现姐姐已长成大姑娘了。母亲苍老了许多，父

亲已七十开外了，背也驼得更厉害了。朱可夫心里很难过，四年来他没有能帮他们做些什么，他已长成小伙子了，但父亲仍为生活而辛苦地劳作。第二天，朱可夫就跟着母亲和姐姐去割草，因为很久没有干农活，他感到很吃力，没干几下就口干舌燥，满头大汗，他咬紧牙坚持着。他想尽可能地帮家人多干些活，以至在他离家时少一些对家人的愧疚。

就在朱可夫假期将满，准备回莫斯科的时候，邻村发生了一场大火。火是从村中间烧起来的，很快蔓延到邻近的房屋、草棚和粮仓。朱可夫第一个奔向消防棚，抬着水龙赶到邻村。火势很快吞没了半个村庄，附近几个村的消防队也随后赶到，尽一切努力扑灭大火。当朱可夫提着一桶水跑过一家门口时，听到有人喊救命，他看见房子的顶上已冒起黑烟，灼人的火苗不时从门和窗子窜向外面。朱可夫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救出了几个被吓坏了的孩子和一位生病的老大娘。当大火终于被扑灭后，朱可夫看到许多妇女在废墟上哭泣，孩子也跟着大哭。许多人家的牛被烧死，全部财产被烧掉；有的人家被烧得一点粮食都不剩。一些人在那里刨来刨去想尽力找到点烧剩下的东西。这一切都让朱可夫内心感到十分沉痛，直到他离家的时候，仍为那些没有了牛和粮食的人们而担心。因为他知道，失去了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朱可夫已经明白，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穷人是没有出路的，任何一次天灾人祸都会让穷人难以生存。朱可夫开始关心政治，虽然当时在毛皮工人中大都不问政治。毛皮工人、成衣工人和其他小手工业作坊的工人，与产业工人不同，他

们与真正的无产者不同，小资产阶级思想很浓厚，缺乏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某些人还想着如何积攒一笔钱，以后开个小店，成为小资本家。朱可夫时常搞些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和《真理报》。虽然他那时还很小，对政治懂的不多，但他已经明白，这些报纸反映了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每次回家，他已经能向周围的朋友讲些他所知道的东西，在小伙伴中树立了相当的威信。

二、当兵就要当好兵

1912 年底，朱可夫的学徒期满了。他已经是一个青年师傅，每月工资有十卢布，这主要是老板信任他，这个工资要比一般的工人高不少。老板认为朱可夫忠诚老实，办事可靠，开始器重他，朱可夫常被派去银行兑取支票或办理存款，从来没出过差错。

朱可夫开始更加用功地读书。为了能得到更多的时间看书，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朱可夫决定搬出作坊，到外面租房子住，因为在作坊里住，老板总是在下工后，还派给他一些急活，这些事占用了他许多的业余时间。通过朋友介绍，朱可夫在奥哈得内街的私人住宅租了个床位，每月租金三卢布。房东是一位待人热情的寡妇，名叫马雷舍瓦娅，她有个漂亮的女儿叫玛丽亚，母女俩相依维命。

朱可夫白天在作坊工作，晚上回到租的房子里学习，常常学到深夜。玛丽亚终于注意到这个好学上进的小伙子，她常常到朱可夫的房里聊天，并约朱可夫一起出去玩。没多久，他们就相爱了，甚至约定了结婚的日期。

就在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和俄国宣战了。在宣传的影响下，许多青年，特别是有钱人的子弟，志愿上前线去打仗。他们都抱着一种幼稚的爱国主义情绪。这时亚历山大也决定上前线，他跑来找朱可夫，劝他一起去当

兵，他对朱可夫说：“我们一起上战场，去打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我们会在战场上成功的，我们会成为英雄回到莫斯科的。”

朱可夫心动了，他找到了他以前的老师傅费多尔·伊万诺维奇。在当徒工时费多尔是所有师傅中最有经验和威信的，也是对朱可夫最好的。朱可夫把他看作自己的长辈。他听完朱可夫的话后说：“我理解亚历山大的心愿，他父亲有钱，他有理由去打仗。你呢？傻瓜，你为什么去打仗？是因为你的父亲被赶出了莫斯科？还是你的母亲被饿得发肿？……你被打残废回来了，就再也没人要你了。”

朱可夫终于被说服了，他告诉亚历山大，他不想去打仗。亚历山大痛骂了朱可夫一顿，当晚就从家里逃走，上前线去了。但没两个月，他就被从前线抬了回来，他负了重伤，送到莫斯科时已不成人样了。他全家人都大哭了一场。

前线的战事越来越紧，伤亡也在不断增大，一列列装满伤员的火车开到莫斯科。莫斯科的大街上随处可见从前线回来的伤兵，他们衣衫褴褛，狼狈不堪。而在莫斯科大街上也不时可见到一些阔少爷们和往常一样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1915年5月提前征召了1895年出生的青年，朱可夫不得不当兵上前线。他和玛丽亚也不得不分开了，战争使他和玛丽亚结婚的希望落空了。然而朱可夫并不害怕，他认为既然当了兵，就要忠诚地为俄罗斯而战。他只是请求在入伍前请假回乡下帮父母收完庄稼，并和他们告别。

从乡下回来后，朱可夫就应征入伍，并被选送到骑兵部队。很快所有应征青年都到兵站被编队，当晚，就被装上货车，开往卡卢加城。

空空的货车车厢一下被挤进了40多人，因为没有客运设备，只能站着或坐在肮脏的地板上，车厢里的人都互不相识。朱可夫是同乡里唯一一个被分配当骑兵的，他一直为此而兴奋，骑兵在人们眼里一直是最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兵种。坐在车厢里，朱可夫想象着自己穿着漂亮的军服，骑在马上，手舞着马刀，有多神气。朱可夫心里问自己：“我吃得了当兵的苦吗？如果要打仗，我行吗？”但很快他就告诉自己：“我经受过生活的锻炼，既然来当兵就要当好兵，我一定能光荣地完成士兵的职责。”

到达军营后，朱可夫被编入后备步兵第一百八十九营，这是属于后备骑兵第五团。在离开这儿以前，他们将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甚至可以说是残酷的。白天要进行枯燥的队列练习，受到排长吹毛求疵般的惩罚，晚上又要学国歌《上帝啊，保佑沙皇》，往往学到深夜。星期天又要去打扫操场和军营，新兵们几乎没有时间休息，班长则警告他们，在写家信时，不得有任何不满情绪的表露，检查官对每一封信都要进行检查。

朱可夫很快适应了士兵的生活，虽然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容易的事。两星期后朱可夫已习惯了军队的各项规章制度。1915年9月，朱可夫所在的第一百八十九后备营就被派往乌克兰境内的后备骑兵第五团。

当列车到达萨文策车站后，迎接新兵的军官穿着各种各样漂亮的骑兵军服，他们有穿骠骑兵制服的，有穿枪骑兵制服的，也有的穿龙骑兵制服。经过分编以后，朱可夫被分进了龙骑兵连。这使得朱可夫感到有点儿遗憾，因为骠骑兵不

仅制服漂亮，那里的军官也比较好，比较讲人道。在沙皇的军队里，士兵的命运是完全掌握在军官的手里的。

骑兵训练更为艰苦，除了一般的课目外，还要学习骑术，掌握冷兵器。每天骑兵要比步兵早起一个小时，晚上晚睡一个小时，一天要刷三次马。而且朱可夫遇上了一位极其残暴的指挥官——下士博罗达夫科。尤其在排长休假期间，他代理排长时，更是毫不顾忌，肆意侮辱士兵。由于自己没文化，他就特别刁难从莫斯科入伍的士兵，因为他们比他有“学问”。夜间，博罗达夫科在几次检查内务值勤情况，发现值日兵打盹，就狠狠地揍一顿，好几个士兵都被他打掉过牙齿。

终于有一天，士兵们忍无可忍，朱可夫和全班士兵商议报复一下。晚上，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博罗达夫科被马披蒙住了头，士兵们狠狠揍了他一顿，直打得他昏倒过去。这件事由于排长打圆场，朱可夫他们才没被送上军事法庭。

训练结束后，朱可夫由于受到排长的器重，被作为训练成绩最好的 30 名士兵送到教导队，准备培养当军士，剩下的则编成补充骑兵连，开赴前线。朱可夫并不想躲在后方训练当军士，他更希望到前线为自己的祖国而战。排长极力说服他，他对朱可夫说：“前线你还是会去的。但是现在更多地学些军事，这对你很有用处。我相信，你会成为一名好军士的。我在前方呆了一年，很了解那是怎么回事，而且也懂得了许多事情……我们的人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死去，请问，这是为什么？……”

朱可夫在后来的回忆中对这位排长的劝说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我衷心地钦佩他的才智、正派和爱兵态度。”当

时，朱可夫从这位排长那里已隐约感到作为一个士兵的天职和一个不愿意与沙皇专制暴行妥协的公民的意愿之间的矛盾。这次机会没有让朱可夫成为无谓的炮灰。

在教导队，朱可夫却遇上了一个比博罗达夫科更坏的长官。虽然朱可夫刚毅、坚强的性格，训练上他很难抓到朱可夫的把柄，因此他没有像对待其他士兵那样暴打朱可夫，也可能是他有点畏惧这个脾气倔强的小伙子。但他却用更损的招儿惩罚朱可夫的每一点小小的过错。朱可夫常常穿戴全副战斗装备顶着马刀罚站，几乎在所有节假日被排作值班。最后由于朱可夫拒绝担任他的抄写员，差一点被开除教导队。

由于朱可夫在教导队里成绩是第一名，队长过问了此事，终于参加了毕业考试，并获得准军士衔，而按理朱可夫可以凭着优异的训练成绩获下士军衔，并在部队担任班长的空缺。

对于旧的沙皇军队的教导队的训练，朱可夫后来给予了客观的评价。虽然在那里不教育未来的军士用人道的态度对待士兵，也不教育他们深入地了解士兵们思想。只追求一个目的，就是把士兵们训练成听话的机器。但教导队的训练搞得非常出色，朱可夫在那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业务上的精通，使他后来成为红军的军事首长不无关系。良好的军事训练造就了朱可夫铁一般的毅力，同时也对旧军队的官兵关系深恶痛绝。

朱可夫被分配去前线——骑兵第十师，为此他知道这是谁的意见，当然他并不害怕，很久以来他就想去战场上经受一下洗礼，他甚至暗自庆幸终于离开了那个混蛋。

在开往前线的运兵车上，朱可夫不断看见一些从前线运

回重伤员的列车停下来为他们让路。从伤兵们那里，不断传来坏消息，诸如军队的装备太差；高级指挥官被德国人收买；伙食很差等等。听到这些，士兵们一声不吭，他们知道前途渺茫，这些伤兵的命运就是他们的未来。

在列车刚到达目的地时，朱可夫经受了第一次战争的洗礼。装卸车时，敌人一架飞机对他们进行空袭，炸死了一名士兵，炸伤了五匹马。

朱可夫所在的第十师开到德涅斯特河岸，成为西南战线的一部分。后又集中到贝斯特里次山林地区，作为步兵进行战斗。部队的损失很大，进攻也基本停止。由于后方闹饥荒，士兵的不满情绪开始增长。农民在沙皇的压迫下遭受的灾难是何等严重，士兵们开始懂得，如果被打成残废或被打死，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不久，朱可夫在一次侦察活动中，踏上了地雷，气浪把他从马上掀了下来，昏死过去，脑子受到了震伤。他被送到哈尔科夫疗养。出院时，由于没有完全痊愈，听觉也不太好，医务委员会建议把他调到补充骑兵连，这时的朱可夫由于一次负伤，一次俘虏了一名德国军官，胸前挂着两枚乔治十字勋章，并被提升为军士。

这段时间，朱可夫遇上了一件关系他一生的重大事件。1917年2月27日凌晨，全连紧急集合，士兵们配发了子弹，并快速向骑兵第五团的司令部前进。士兵们都莫名其妙，不知去执行什么任务。在路上他们碰到一些手执红旗的示威群众。一个高个子士兵转身向周围的士兵演讲起来。他说：“俄国的工人阶级、士兵和农民不再承认沙皇尼古拉二世，也不

愿再为资本家和地主卖命。俄国人民不愿再继续这个血腥的帝国主义战争；他们要和平、土地和自由。”

士兵们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和游行的工人混合到一起了，四处响起“乌拉”的欢呼声。很快朱可夫知道了，他们的骑兵大尉和其他一些军官被士兵委员会逮捕了。部队返回驻地第二天，士兵委员会被派来命令连队选举出席团苏维埃代表和本连士兵委员会。朱可夫被一致推选为连士兵委员会主席，并出席团苏维埃代表大会。

当时，军队里的内部斗争非常激烈，朱可夫所在的团没过多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钻进去掌了权，重新拥护临时政府。几个分队甚至叛变，跑到白军方面去了。由于当时情况复杂，朱可夫和连士兵委员会决定解散连队。给士兵发给退伍证，但鼓励他们带走武器和弹药。

朱可夫在连队遣散后却被投到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方面去的军官搜捕。几个星期他只能躲在巴拉克列亚城内和拉格尔村里。直到1917年11月30日，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几个星期，朱可夫才回到莫斯科。此时的朱可夫已接受了相当多的革命思想，他决心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俄国革命的洪流中去。

几个月后，朱可夫决定回乡间父母亲那里，休息一段时间，并在那里加入赤卫队。但是，回乡没多久他就得了严重的斑疹伤寒，紧接着又生了回归热，这场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朱可夫凭着顽强的意志战胜了疾病，重新站了起来。半年后，刚痊愈不久的朱可夫再次回到莫斯科参加了莫斯科骑兵军一师第四团，终于实现了他加入红军的愿望。

三、参加国内战争

在 1918 年到 1919 年冬季，红军和白军都开始整顿自己的队伍，为春季的战斗作准备。此时，随着同盟国的崩溃，力量对比开始有利于布尔什维克。但在俄国南部的白军仍然构成不小的威胁，顿河军、志愿军和高加索军三支白军部队都在那里，而且他们装备精良，在服装、武器和物质供应上都比红军优越。

朱可夫所在的莫斯科第一骑兵师，是伏龙芝部队的一部分，在乌拉尔斯克附近通往希波沃车站的接近路上与乌拉尔的哥萨克白军进行了第一次战斗。这一仗打得很成功，士兵的士气受到了鼓舞。与此同时，朱可夫参加了他那个连的共产党同情者小组，准备入党。

1919 年 3 月 1 日，朱可夫正式加入共产党，朱可夫后来回忆道：“从那以来很多事情我都忘掉了，但我入党的这个日子，我是终生难忘的。”9 月在察里津（1925 年后改名为斯大林格勒）附近爆发的一场战斗中，朱可夫再次负伤。当时的战斗非常激烈，双方损失都很大。最后在白刃战时，朱可夫被手榴弹炸伤，弹片深深地嵌入了他的左脚和左肋部，他不得不被撤下来送进医院。

这次朱可夫的伤势很重，从医院出来时，身体极为虚弱，他被给予了一个月的假期恢复健康，他就借此机会回家探亲。

假期很快过去了，朱可夫跑到兵役局请求去作战部队，但却由于身体没复原而被送到后备营。随后又被派到红军指挥员训练班去学习。这个训练班在梁赞省的斯塔罗日洛沃，主要是为那些在战争中表现突出的人办的。朱可夫当了第一连的司务长。

朱可夫在1920年7月结束了骑兵训练班的学习后，来到莫斯科接受进一步的训练。此时的朱可夫已成为正式的军官。值得一提的是，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他去找他过去相恋的女朋友玛丽亚，但当他来到过去住过的地方一打听，玛丽亚已经嫁给了别人。朱可夫很伤心，只是没去再找玛丽亚，他认为作为一名军人理应坚强地面对生活，而不能为儿女私情所左右。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从此以后再没见过玛丽亚。几年后朱可夫遇到了另一个姑娘，名叫亚列克山大拉，婚后生了两个女儿，爱拉和耶拉。一直到朱可夫晚年遭受政治上的挫折而离婚，这是后话。

在这个时期内，朱可夫开始显露出他的军事才华，并受到了红军领导人的注意。当时作为伏龙芝的属下，朱可夫受到不少伏龙芝军事思想的影响。伏龙芝是俄国最优秀的军事领袖之一，也是一位杰出的理论家，他帮助创建了年轻苏维埃国家的军事理论。

8月份，朱可夫所在的学员混成团在莫斯科第二学员旅的编成内集中到克拉斯诺达尔，然后从该地出发去攻打弗兰格尔的军队。没多久苏联和波兰签订了临时和约，这标志着弗兰格尔的白军失去了波兰人的支援，很快他们和红军在人数上成了1：4之比。

朱可夫所在的营没有参加最后歼灭弗兰格尔军队的战斗。因为在和弗兰格尔军队的战斗中，有相当数量的指挥人员遭到伤亡，这就急需一批训练最好的学员提前毕业，去充实骑兵步队。朱可夫被派到独立骑兵第十四旅的骑兵第一团，剩下的学员受命追击逃往高加索山里的匪徒。后来这批学员在山里遭到伏击，受到严重的损失。许多指挥员和战士受到匪徒非人的折磨，朱可夫尊敬的团政委也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这对朱可夫来说是件沉痛的消息，他为没能和他的同学和战友在一起同生共死地参加战斗而遗憾，也为失去了许多朋友而痛惜。

朱可夫来到骑兵第一团后被任命为排长。因为新的服装还没发下来，朱可夫只得穿着学员兵的红裤子去上任。果然全排集合后，几个战士故意盯着他的红裤子，似乎在取笑一个学员的幼稚。朱可夫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不喜欢红裤子，但我没有其他的裤子。苏维埃政权发给我什么，我就穿什么，现在我还无以报答。至于我是好排长还是赖排长，你们是好战士还是赖战士，咱们将来走着瞧吧！”

几天后，朱可夫带领他的排与海边上的残匪作战。他身先士卒地冲在前面，并很快肃清了敌人，有的被打死，有的被俘虏。而朱可夫带的排却毫无损失。此次战斗以后，战士中再没有谈论朱可夫的红裤子了。

朱可夫就这样很快取得了士兵的信任和上级的赏识。不久他就被提升为骑兵第一团第二连连长。1921年春，朱可夫所在的部队与安东诺夫匪军进行了多次艰苦战斗。一次朱可夫所带的连队与两倍数量的安东诺夫骑兵相遇。两军相遇勇

者胜，朱可夫一马当先，带领全连向敌人猛冲过去。在白刃格斗时，朱可夫的马被刺倒，把朱可夫压在马下。政治指导员诺刀夫卡及时赶到，把他救了出来，并帮他夺了白匪的一匹马。当天，在又一次冲锋中，朱可夫的马匹再次被打倒，他只能用手枪向敌人射击。因为这次战斗中朱可夫的表现，朱可夫被授予了红旗勋章。

国内战争时期，对朱可夫来说是一段艰难的日子，出生入死，许多战友在身边倒下。在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考验中，朱可夫经受了锻炼，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同时他也感到自己在军事学理论上的不足。他渴望在军事学上得到进一步的深造。

四、我们要成为最好的师

随着苏联国内战争的结束，国家开始着手和平建设。大量的军队复员，从1920年到1924年底，整个苏联武装部队人数由550万缩减为56.2万人。朱可夫虽然知道在和平时部队提升很慢，但他仍然决定留在部队。对于改组军队的计划，朱可夫并不像许多战时领导人那样，认为是贬低了他们的战功。他认为改革是必要的，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学习来提高自己的。

从1922年6月到1923年3月，朱可夫先到骑兵第三十八团担任一个连的连长，接着就提升为萨马拉骑兵第七师第四十团的副团长。1923年4月，他被任命为布祖卢克骑兵第三十九团团长。

接到团长的任命后，朱可夫的心情非常激动。指挥一个团始终被认为是掌握军事学术的最重要环节。团是基本战斗部队，团一级的战斗需要组织陆军各兵种的协同作战，有时还不仅限于陆军的各兵种。

朱可夫26岁当上骑兵团长，他当团长觉得自己在实际工作方面比在理论问题上强，这就迫切需要加强理论学习。但作为一个团的领导，团里事事都得管，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朱可夫又在每天的工作日程上再加上3—4个小时自学。

1924年，朱可夫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列宁格勒高等骑兵

学校学习。课程相当繁重，朱可夫以坚韧不拔，甚至狂热的劲头学习。在这段时间里，朱可夫受到了系统的军事学习和训练。同时他也有意识地在意志品质上锻炼自己。

一年以后，朱可夫在深造班结业时，他和几个同学要求不乘火车而是骑马返回明斯克的工作地。路程有 963 公里的田野道路完全靠骑马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而且在沿途上没有组织检查站、保养和膳食，俄罗斯寒冷多雨的秋天已经来到，这些都给这次远行造成了困难。但朱可夫决心已定，他们将准备创造一项集体乘马远行的世界纪录。在这次行程中朱可夫遇上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他骑的那匹马跛了，为了减轻马的负担，他常常要下来，牵马走很长的距离，体力消耗很大。朱可夫并没有就此而放弃，也没有延缓日程，他认为这正是一个绝好的锻炼机会。每天他要以更长的时间用在路上，以在当天赶上同伴。就这样朱可夫一行完成七天走完全程的远行计划。在明斯克他们受到了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同时，也获得了政府的奖金和首长的嘉奖。

回到部队，朱可夫被任命为新编的第三十九团团长的。当时苏联正实行军事改革，其中一项重要的措施，就是贯彻单一首长制。在此我们需要提一下，单一首长制的两种形式。第一、如果指挥员是共产党员，那么他同时兼政委，把对军事训练、行政管理工作和党政工作的领导集中在一人手中，给他配有一名管政治的助手；第二、如果指挥员不是党员，他只担负军事训练和行政管理工作，而党政工作由政治委员领导，政治委员和指挥员共同对部队的政治思想和战备状况负责。在苏联的军事历史上，单一首长制在战争年代起到了相

当重要的作用，但也多次被取消。朱可夫始终主张在军队实行单一首长制，这也成为后期政治挫折的一大罪名。这是后话。

1926年冬季，由于团的工作出色，朱可夫被正式任命为团的单一首长，并成为骑兵第七师的第一个单一首长。1930年5月，朱可夫又被任命为萨马拉骑兵第七师骑兵第二旅旅长。

朱可夫再次被派往莫斯科，进高干深造班学习。这次高干深造班的课程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教员都是在战术和战役学方面很有修养的专家。朱可夫在这里收集了所有能够得到的各种军事著作。他阅读了《伏龙芝选集》、沙波什尼科夫的《军队的大脑》、《骑兵》、《在维斯拉河》、叶戈罗夫的《消灭邓尼金》、特里安达菲洛夫的《现代军队的作战特点》，以及图哈切夫斯基对未来战争的论述。朱可夫接受了许多图哈切夫斯基有关新的理论原则和战略、战役、战术和新思想。另外，朱可夫对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发生了兴趣。他开始学习一些德国的军事学说，他很受德国军事理论家汉斯冯·泽克特的影响。泽克特强调在突破作战中使用装甲部队，以高速机械化部队为基础的闪电战术给朱可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高干深造班的学习对朱可夫以后的军事上的成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1930年，朱可夫从高干深造班毕业没多久，就被任命为工农红军骑兵监察部的助理。当时朱可夫并不愿意，他在基层呆了相当长的时间，和第七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同时他对上级机关的工作并不太感兴趣，那里往往存在着官僚主义

的工作作风。但作为军人，他还是服从了命令。朱可夫带上妻子和两个女儿回到了莫斯科。可幸的是骑兵监察部由布琼尼将军领导。能够成为布琼尼的副手，朱可夫得以从更高层次认识战役战术问题，军事素养更趋成熟。

1933年3月，朱可夫经监察部副部长科索果夫推荐，被任命为第四骑兵师师长。朱可夫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命。因为第四骑兵师是第一集团军的核心，有着光荣辉煌的历史。能去这样的部队无疑是一种考验，同时也能学到很多东西，这正是朱可夫所希望的。

当朱可夫来到白俄罗斯上任时，发现他对于第四骑兵师的了解是很不够的。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师是匆匆忙忙被调驻白俄罗斯的，驻在斯卢茨克城。当时第一军的领导对第四骑兵师不能提供任何帮助，这个师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自己建营房、马厩、司令部、住房、仓库和训练设备。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变成了一支蹩脚的劳动部队。加上建筑材料不足、雨季和其他的不利因素使这个师未能及时做好过冬的准备。朱可夫接任该师师长时，这个师纪律松懈，常出病马，训练搞得一团糟。这些都远远出乎朱可夫的意料。

为了尽快把第四骑兵师的工作抓起来，朱可夫亲自到所属各分队了解情况，弄清症结之所在，找出原因，并同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一起确定克服缺点的途径。他以罕见的耐心和克制态度来观察、学习和教导别人，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工作。

朱可夫对工作要求非常严格，自己也以身作则。他坚持不渝地要求部下把工作干得尽善尽美，对各个细节都要予以

注意。这些使得朱可夫获得了要求严格，具有钢铁般意志的指挥员的名声。例如：除了在车间、汽车房或是坦克停放场，朱可夫禁止任何人穿工装；在任何时候都始终得穿规定的制服。作战车辆在演习回来后必须立即擦洗，不管是什么时候。朱可夫还坚持要求每个人把皮鞋擦得亮亮的。

有一次，朱可夫在检查值勤哨兵时，发现有一个士兵的皮鞋擦得不太亮。他立刻把值日官叫来问他，这个哨兵的皮鞋怎样。值日官命令这个哨兵解释他的皮鞋为什么没擦。朱可夫打断他的话说：“我问的是你，而不是他，我感兴趣的不是你的反应，而是你的意见。解释并不能使鞋变得干净！”

随后朱可夫又对周围的每一个人说：“在这件事情上，重要的不是鞋擦没擦，而是有没有注意这个问题。战士可能由于疏忽没擦鞋，但你应当要求战士在值勤巡逻之前一律把鞋擦干净。每一层领导都应该这样要求他的部下。而现在问题在于，看来除了我就没有别人去帮助他擦鞋了。”

朱可夫命令副官拿来小凳子和擦鞋用具，让这位战士把一只脚放在凳子上，十分认真地擦起来，并告诉战士如何才能擦亮皮鞋，擦完一只鞋后，朱可夫把刷子递给那个战士，让他擦另一只，擦完之后和值日官一道到团部报告。从此以后，士兵们的皮鞋始终擦得很亮。

还有一次，一个坦克连进行战术演习回来，已是夜里了，战士们都疲惫不堪，连长要求坦克场的值日官允许将稍加擦洗的坦克停在场里，并一再保证第二天早晨彻底擦洗。看到战士疲惫的样子，值日官犹豫了一下就同意了，尽管他知道朱可夫是绝对不允许他这样做的。

一个钟头后，朱可夫来到坦克场检查坦克。值日官立即为此事辩解，并一再声明战士确实是太累了，他不忍心让他们再接着擦洗坦克。他的解释惹恼了朱可夫，朱可夫忿怒地训斥他：“愿意帮助同志是非常值得赞扬的品质，但是，你知道，你并没有帮助他们，相反，你却违抗了指示，也让他们违反了军纪和命令。我和你一样清楚，他们确实很疲乏，擦洗有困难。但你知道，你们应征入伍正是为了经受训练，为未来经受严酷战争考验作准备。演习之后的疲乏，和我们每个人在战时将要经受的考验比起来，简直是儿戏。你应当撤职受军法制裁，但我今天破例不这样做。党组织将审查你的行为并作出裁决。那样可能对你有好处，然后我们再看还应给你什么处分。”

朱可夫命令连长和营长负责，让全连战士把坦克擦洗干净。两小时后，朱可夫命令擦洗完坦克的战士回去休息，但连长和营长留下。他认真检查了一遍坦克后，对连长说：“我感到你还不够成熟，不足以担任连长。你认真考虑考虑，然后告诉我你自己的意见，太晚就不行了。我警告你，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绝不这样轻易放过你！”后来这位年青的连长成为苏联卫国战争的英雄，并作为坦克师师长立下了赫赫战功，并获得了列宁勋章。

朱可夫就是这样在部队造成一种有秩序的气氛。战士们并不害怕他，但大家都感到了他的威信，他们常常不自觉地依靠他。在朱可夫的第四骑兵师，大多数人都不愿离开，因为和朱可夫在一起比和别人在一起工作好干。他们可以向他学习；同时他是有名的公正的指挥员。他对自己和对部下的

要求一样严格。只要工作需要，他不管白天黑夜都照样干。他经常夜间出来巡视，如果发现什么问题，就要求立即纠正，或者要求把没干好的事情从头再干，哪怕已是深夜。

在带兵上朱可夫有个原则是：“如果你不会干，我们可以教给你；如果你不想干，我们就要迫使你干。”

1935年在朱可夫及全师官兵的努力下，第四骑兵师发生了重大变化。营房建筑全部完成，所有的部队都有了良好的营房和训练设备。在校阅中，该师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并因为学习和军事训练中的优异成绩获得政府最高奖励——列宁勋章。

在朱可夫担任师长的四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坚持这样一个信念：“使我所指挥的师成为红军部队中最好的师、最先进的师。”为此朱可夫付出了大量的劳动、精力和心血，使这个师摆脱落后状态，教会指挥干部和司令部掌握现代战术，掌握组织和指挥部队的种种方法。

五、重视坦克的作用

在朱可夫担任骑兵团长时，苏联军队组建了第一批坦克部队。朱可夫的部队被挑选为使用这种新武器的试点。这对朱可夫的成功和以后他在苏联军事指挥系统的迅速提升起到了决定作用。在和平时期，朱可夫由一个团长提升为红军总参谋长，随后又提升为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这与朱可夫主张并参与红军的机械化和摩托化不无关系。当然朱可夫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但在红军将领中具有同样杰出才能的军事领袖不乏其人，而历史条件却造就了朱可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红军的机械化和摩托化早已开始，并随着战争的临近而加速发展。在这一时期朱可夫和红军参谋长沙波什尼可夫一道努力使军队领导相信，在现代战争中坦克可以起独立的作用，这个新的强有力的武器不应和行动缓慢的步兵部队一道展开，这只能降低它的威力，必须建立机械化集团军。因此在战前朱可夫已经处到很高的位置就不足为怪了。

另外，必须提的一点就是来自 1937 年的军队大清洗。一大批杰出的军事将领惨遭杀害。苏联著名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叶果罗夫元帅、布留赫尔元帅都先后被捕并被处死。5 名元帅只剩下优罗希洛夫和布琼尼 2 名。从 1937 年 5 月至 1938 年 11 月间，另外还有 15 名集团军司令被清洗掉 13 名，仅剩 2 名；85 名军长被清洗掉 57 名，剩 28 名；195 名师长

被清洗掉 110 名，剩 85 名；406 名旅长被清洗掉 220 名，剩 186 名。斯大林仅在肃反运动中，处死了近 35000 名红军指挥员。

赫鲁晓夫后来在 1961 年 10 月苏共二十二大透露了这次清洗运动的一些情况。他说：“有一次在国外报纸上出现了一条奇异的新闻，说什么希特勒在准备进攻我国时，通过自己的谍报机关假意遗落了一份假文件，说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是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这‘机密’文件落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贝斯手中，看来他是出于好意把文件转交给斯大林。因此，雅基尔、图哈切夫斯基等同志便被逮捕，然后被杀害了。”对于这些没有丝毫罪过的，却被指控为叛国和反党活动罪的数万名军官被杀害，完全是希特勒等人精心策划的。

肃反运动给红军造成的巨大损失，远远超过一场战役的失败。直接后果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进攻苏联时一触即溃。苏联武装部队由于失掉了一大批具有丰富经验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在大战开始时，军队许多职务都由年轻干部担任，他们缺乏在复杂环境中统率军队的充分知识和经验。

朱可夫后来评价这次运动为“反常的、完全不符合我们社会制度实质的、也不符合当时我国具体情况的事情，毫无道理地违反了社会主义法制”。但这次大清洗的厄运并没有落到朱可夫的头上，反而为他提供了更快提升的机会。主要是因为斯大林出于对骑兵领导人的特别态度。斯大林对骑兵领导人布琼尼的信任，使骑兵部队高级指挥员受镇压的人数比其他部队少得多。所剩的两名元帅全是骑兵出身，就是佐证。

由于政治环境的恶化，无疑打击了红军领导人的创造性和主动精神，朱可夫也相对地保持沉默了。这一时期的最高统帅部的人大多平庸和缺乏经验，正是这些人说服了斯大林，没有采纳朱可夫和沙波什尼可夫关于组建大规模机械化部队的建议，甚至解散已有的大的坦克部队。只有到了1941年红军节节败退时，朱可夫的看法才被重新采纳，这是后话。

1937年朱可夫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三骑兵军军长。不久，他又被推荐担任第六骑兵军军长。由于朱可夫以前指挥的第四骑兵师属第六骑兵军，所以他很高兴地接受了任命。同时朱可夫开始研究骑兵机械化集团军中骑兵的战斗使用问题。他非常重视骑兵同坦克部队的协同作战和战役中对坦克防御的组织问题。

当时，在第三军和第六军的各种野外演习，朱可夫都要求同独立坦克第三十一旅或独立坦克第三旅配合行动，因为这两位旅长过去都是朱可夫的同事，这样在“战斗情况”中彼此非常容易理解。

在朱可夫任第三骑兵军军长之前，朱可夫曾被作为主要军事观察员之一派到西班牙。在1936年秋到1937夏，朱可夫充分利用了西班牙内战这一宝贵的试验场，新式武器得到试用，一些有争议的现代战术概念，也可以进行研究，看效果究竟如何。苏联装甲部队在西班牙参加过多次战斗，有时打得很出色，但有时也会因为战术不妥或笨拙的试验而常常失利。

1938年夏，朱可夫又被作为军事使团的一员派往中国，了解日本军队的战略战术，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后来证明

朱可夫在中国没有参与中心工作，他的才干也没有被发挥，近乎于无事可干。同年冬天，朱可夫被调回国内，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这样他就有了指挥一个大战役军团的机会，也为他展露才华创造了条件。

对于朱可夫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一份 1943 年 5 月俘获的德国军事文件中有所了解。上面写着：“朱可夫是个说话坦率勇于行动的人，他的特点是毅力胜过智力。在苏联军界很受重视，被认为是非常能干的军官和优秀的组织者。他第一个主张大规模使用坦克，并在实践上成功地加以运用。”敌人的评价往往具有客观性。

六、哈勒欣河初露锋芒

1939年6月1日，在白俄罗斯第三骑兵军司令部，作为军区副司令员的朱可夫正在对刚进行的一场演习讲评。参加演习的各兵团指挥员、参谋长和作战参谋人员坐了一屋，大家静静地听着，并不时作着记录。一阵急促的电话铃从隔壁传来，没一会儿，军区军事委员苏赛科夫急匆匆跑进来，打断了朱可夫的发言，他低声地告诉朱可夫，刚才莫斯科来电话，命令他立即动身，到国防人民委员会那里报到，看来情况相当紧急。

朱可夫草草做了交待后，立即踏上前往莫斯科的最近一趟列车，第二天清晨，朱可夫赶到国防人民委员优罗希洛夫的接待室。此时他预感到有可能与战争有关。秘书告诉他，优罗希洛夫已经在办公室等着他，并且说：“您进去吧，我马上去命令给你准备远行的行装。”

“什么远行？”

“进去吧！人民委员会告诉你一切的。”

进门后，优罗希洛夫和朱可夫握了握手，表情严肃地告诉朱可夫，日军突然侵犯了蒙古，根据苏蒙1936年3月12日的苏蒙条约，苏联政府有责任保卫蒙古不受任何外敌侵犯。他走近地图向朱可夫大致介绍了一下情况，指着哈勒欣河以东地区说：“我认为，这里孕育着严重的军事冒险。无论如何，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你是否可以立即飞到那里？如果需要的话，把部队的指挥权接过来。”

“我可以马上起飞。”朱可夫立即回答道。

“很好，你乘坐的飞机 16 点可以准备好，在中央机场。你现在到斯莫罗基诺夫那儿去，从他那儿拿你所需要的材料，并商量一下同总参谋部今后的联系问题。派给你的几个专业军官将在飞机上等你。再见，祝你成功。”

飞机降落在苏联国境线上的最后一站赤塔，6 月 5 日晨，朱可夫一行到达塔木察格布拉克，在第五十七特别军司令部听取军长费克连科、军政委尼基舍夫、参谋长库谢夫等人的情况汇报。然而汇报的情况让朱可夫大失所望。很显然，军的领导并不了解真实的情况，除了政委尼基舍夫以外，没有人到过发生冲突的地域。”

朱可夫问费克连科，他是否认为可以从距战场 120 公里以外的地方指挥部队。费克连科举了一大堆理由，诸如作战方面尚未做好准备，电话电报线路没有敷设，没有现成的指挥所和着陆场等等。

朱可夫强忍不满地说：“面对这种情况你们准备怎么办呢？”

“我们准备派人去搞木料，然后着手构筑指挥所。”这样的回答很难让人满意，朱可夫建议军人随他一起到前线去。但费克连科却借口莫斯科随时可能来电话找他，便让军政委陪朱可夫去。

到了前线，朱可夫仔细观察了发生冲突地域的地形，并与红军和蒙军的指挥员、政工人员及参谋人员谈话，很快进

一步了解了次次战事的性质和规模，对日军的作战能力也有了新的印象。同时他也发现红军和蒙军都缺乏周密的侦察。

返回指挥所，朱可夫如实向国防人民委员会报告了情况，并简略地陈述了苏蒙军队的行动计划。第二天，人民委员会就批准了朱可夫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同时解除了费克连科军长的职务，任命朱可夫为军长。

朱可夫根据情况，要求国防人民委员会加强航空兵部队，增调不少于三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的兵力到作战地域，并要求大大加强炮兵力量。很快，总参谋部同意了他的要求。

6月22日至26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空战，很显然，日军的目的在于严重挫伤苏军的空军力量并夺取制空权，以保障其部队将要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日军制订了“诺门泽事件第二阶段”的战役计划。战略目标是：

- 1、围歼哈勒欣河东岸的全部苏蒙部队；
- 2、渡过哈勒欣河，前进至河的西岸，以便消灭苏军预备队；
- 3、夺取并扩大哈勒欣河西岸之登陆场，以保障尔后的行动。

7月3日拂晓前，日军以三倍的优势连夜偷渡哈勒欣河，向在那防御的蒙古第六骑兵师发起了进攻。很快占领了巴莫查岗山及其邻接地区。日军继续推进，准备包围河右岸的苏蒙军队。

蒙军迅速向苏军指挥部报告了情况，情况十分紧急，日军在这个地域展开进攻，可以丝毫不受阻拦地对苏军主要集团的翼侧和后方进行突击。朱可夫猜测到敌人的意图，立即

决定调动所有的预备队，迅速向巴英查岗山方向前进，并从三面向日军发动进攻。当时日军在巴英查岗山集中了 1 万余人，而苏军总共只有 1000 多人。日军拥有近 100 门火炮和 60 门反坦克炮。而苏军只有 50 几门火炮。

朱可夫命令坦克第十一旅从行进间向日军发起进攻。同时摩托化步兵第二十四团加强了一个炮兵营从西北协同坦克第十一旅的进攻；摩托化装甲第七旅从南面进攻。苏军的机械化部队近乎闪电般的进攻，是日军怎么也想不到的。一个日本兵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几十辆坦克突然向我们冲来。我们当时惊慌失措；战马嘶叫，拖着火炮前车四处奔跑；汽车也四处乱窜……”日军队伍陷于一片混乱。

很快，日军三面受到包围。由于周围几百里，完全是开阔地，甚至连灌木丛都没有，日军士兵无处隐蔽。战斗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日军的抵抗就被彻底粉碎，开始仓皇向渡口退去。但是，日军工兵由于害怕苏军坦克的突破，已把渡口炸毁。日军官兵全副武装地跳入水中，许多人在泅水逃生时溺死水中。

这一仗日军丢下了几千具尸体，大量被击毙的马匹，一堆堆被击毁的火炮、迫击炮、机枪和车辆铺满了巴英查岗山。同时在空战中损失飞机 45 架。苏军彻底粉碎了日军的战斗计划，并严重打击了日军的锐气。从此以后，日军再也不敢贸然跨过哈勒欣河。

巴英查岗山一役胜利后，朱可夫开始着手进行总攻的准备工作，目的在于最后粉碎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日军。他明白哈勒欣河战役的重要意义不可低估。全世界都在注意

这场战斗的结果；这对苏联的国际威望很有影响，更重要的是，这是实战情况下试验新装备、新技术的难得机会。

当然，日军失败后也很不甘心，开始准备重新发起进攻的计划。到8月初，日本已集结了大约7.5万人在哈勒欣河地域，304挺重机枪，500门大炮，182辆坦克和300到500架飞机。日军已准备了地面部队开始进攻的阵地，并计划8月24日沿着所占桥头堡全部43英里的战线发起总攻。

朱可夫也向军事委员会要求增加部队及物质技术器材。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朱可夫都保持这样一个作风，要发起反攻，步兵必须占1.5对1的优势，机枪1.7对1，炮兵和飞机几乎2对1，而坦克要4倍于敌人的优势。而且他这种作风后来变得越来越突出。因此斯大林这样评价朱可夫：“他总是要求多给些人，多给些枪炮，还多给些飞机。他总觉得不够。但他从来没打过败战。”

为了达到朱可夫发动总攻的要求，把大量的物质从供应站沿长达650公里的土路运到哈勒欣河。红军动用了3500辆卡车和1400辆油槽车不分昼夜地运输，在当时灼热的气候条件下，往来一趟1200—1300公里要花费5天的时间。终于在8月18日，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朱可夫决定在不迟于20日前发动总攻。

在这期间，为了迷惑日军，朱可夫采取了许多有趣的措施。朱可夫命令部队故意修筑防御工事，还把一部强大功率的音响装置运到前沿，模仿打桩的声音，逼真地造成了大规模修建防御工事的印象。为了欺骗敌人，调动全部军队在夜间进行。用夜间轰炸机空袭和小火器射出来的声音掩盖坦克

集结在出发阵地时发出的声音。在进攻前 10 几天中，几辆坦克都卸去灭音装置，沿前沿阵地不断来回开动，以使日本军队对坦克的声音习以为常。

朱可夫还想出一个巧妙办法，每一个战士都得到了一本《苏联战士防御须知》，并让战士认真学习。而进攻战役计划是绝对保密的。为了使计划不至泄露，从战斗行动开始前四天至前一天，才逐次向各级指挥人员传达。在进攻前三小时向战士和军士下达战斗任务。

1939 年 8 月 20 日，一个天气晴朗、平静的星期日，哈勒欣河宁静得让人忘记了战争，许多日本军官像往常一样星期日休假，有的人甚至离开部队，到海拉尔等地去游玩。因为日军指挥部已经深信苏蒙军队不想进攻，也没有做好准备。而四天后日军的总攻将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清晨 5 点 45 分，苏军的炮兵开始对日军的高射炮和高射机枪阵地进行突然猛烈的射击。同时，150 架轰炸机对日本防御阵地的前沿、贴近预备队和炮兵阵地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随后朱可夫命令南方、北方和中央三个集群全线出击。当时的情境可以从一个日本兵的日记得到证实：“炮弹遮天盖地般落在我们的前前后后，真可怕。观察所想尽一切办法找寻敌人的炮兵，但是不成功，因为轰炸机在轰炸，歼击机在扫射。敌人全线获胜。”

在一个半小时内日军的炮火都无力进行还击，日军的观察所、通信联系及炮兵阵地均被摧毁。苏军的装甲坦克部队和机械化部队渡过哈勒欣河，并迅速突破了日军的防御。仅用三天，朱可夫的包围计划就全部完成。

虽然只要把被围的日本人困住就必然会使他们最后投降，但朱可夫不容许采取这样消极的办法；必须发动一系列的进攻，全部歼灭敌人。

在这场战斗中，有一件事充分反映了朱可夫果断的领导作风和才能。朱可夫命令一个师攻打日军的防御工事。这一进攻能否成功关系到整个战役的胜败。而日军的抵抗非常顽强，常常战至最后一个人。苏军遭受重大损失给打了回来，并再也无法前进一步。师长打电话，请求下达新的命令。朱可夫命令他再次进攻。过了一会儿，朱可夫亲自打电话找那位师长。当确信他还没有让部队向前推进时，朱可夫问道：“你能够发起攻击吗？”师长审慎地表示了他的疑虑。

朱可夫说：“现在我解除你师长的职务。让你的参谋长接电话。”当朱可夫从参谋长那儿获得了肯定的回答后说：“现在我任命你为师长。”但这位参谋长也没能发动一次新的进攻。在他向朱可夫汇报了这一情况后，他接到同样的命令：“我解除你师长的职务。等候新师长到来。”

朱可夫从他自己的参谋部派去一位新师长，并用炮兵加强了这个部队，还以空军加以支援。在付出重大伤亡代价后，这次进攻成功了，他制定的进攻计划的其他部分也都成功了。

不久朱可夫就被誉为有名的严厉果断的指挥员，对下属的行动缓慢，犹豫不决和迟钝，他都不能容忍。另外，朱可夫的另一特征开始表现出来。他在强大的压力下仍然能保持镇静，并能完全掌握形势，对战争的胜利充满自信。

有一次，朱可夫刚洗完他清晨的澡回来，在蒙古大草原中间的一座名叫哈玛巴达的青山上接受一群苏联战地记者的

采访。他一面穿衣服，一面轻松地和记者们聊着，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突然两个红军侦察兵气喘吁吁地跑来。他们十分惊慌地报告说，日本人正在集中大量部队，显然是准备发动一次有力的反攻。记者们都紧张起来，以为朱可夫会感到震惊，并立即下达命令。但是出乎记者的意料，朱可夫镇定自若地穿上衣服，冷静地告诉侦察兵，发动这样的反攻是完全不可能的，日本人已经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反击了。

朱可夫的话立即改变了原来的紧张气氛。每个人都绝对地放心，他们相信朱可夫的话是不会错的。但是，侦察兵纳闷他们怎么会被自己的眼睛所欺骗，记者们也纳闷他们怎么会被自己的耳朵所欺骗。

1939年8月30日，侵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的日军被全部歼灭。在苏蒙军队的毁灭性打击下，日军一个集团军精锐部队仅在10天之内遭到前所未有的全军覆没。朱可夫是苏军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主要因素。朱可夫的军事才能在这次战役中得到充分表现，他在战术上集中优势兵力，他大胆成功地制定了包围计划，他坚决而又机智地歼灭被围之敌，他使各个兵种互相配合，并把几种现代化武器结合起来，特别是各种攻击措施，所有这些造成了苏蒙军队的全面胜利。朱可夫的指挥效能从伤亡数字的比较中就可得到有力证明。在哈勒欣河战役中，苏方伤亡损失是1万人，而日方却损失了5.2万到5.5万人。

日本人被迫承认：“在这之前我们不知道苏联把他们的摩托化部队装备到什么程度。”这一出乎意料的发展使他们大为震惊。哈勒欣河战役充分向日本人证实，大部分苏联地面部

队，特别是炮兵和装甲部队，在火力和机械化方面，都远远比日军强。后勤工作也很突出。苏军能在远离铁路终点 650 公里的战线上调运和储存作战物资，这是日本人绝没想到的。日本人终于明白，“苏联军队已不再是日俄战争时那支缺乏灵活性的旧的沙皇军队。他们不仅能够在每次战斗中采用不同的战术，而且保持着俄国军队一向顽强的特点。并比预料的坚韧顽强得多。

1939 年 9 月 15 日，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在莫斯科签订了一个协议，要求停止一切作战行动，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划立哈勒欣河地区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满洲之间的边界。1941 年 4 月苏日签订了互不侵犯协定，两国都避免进攻对方，直到 1945 年苏联破坏协议，向日本宣战，日军始终没敢向苏联进攻，甚至是在 1941 年底，莫斯科保卫战苏联最困难的时期。这不能不说和在哈勒欣河日本得到的惨痛教训有关。

1940 年 5 月初，朱可夫接到命令，去人民委员会另行分配工作。当他回到莫斯科时到处是一片赞扬声。政府颁布命令，提前晋升朱可夫为大将军衔。几天后，斯大林亲自接见了朱可夫，并任命他为基辅特别军区的司令员，基辅特别军区是苏联最大的军区。

朱可夫在向斯大林汇报哈勒欣河战役时，评价日本军队：“日本士兵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级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他们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迟疑。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日军的技术装备落后，

尤其是坦克，非常落后，武器差，最大行程小……”

当斯大林问到苏军的战斗情况时，朱可夫作了详细的分析，最后说：“我认为，日本方面如今对于红军的力量和作战能力已经得出了一个比较正确的结论。”对朱可夫回答，斯大林非常满意，笑着对朱可夫说：“现在你已经有作战经验了。你到基辅军区去以后，利用你的经验训练部队。”

这次会见给朱可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他第一次亲眼见到斯大林。同时，他也给斯大林留下良好的印象，从此以后斯大林更加重用朱可夫。

七、风暴即将来临

在朱可夫对日本人作战胜利回到莫斯科时，欧洲的事态已发展到危急关头。1938年2月希特勒发表讲话：“不要以为世界上有任何人能阻碍我实行我的决定！……英国不会给奥地利任何帮助。……至于法国！……法国要帮忙也来不及了。”一个月后，希特勒的坦克跃过边境线，毫不费力地占领了维也纳。第二年3月，在英、法政府的怂恿下，德国军队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同时希特勒又虎视眈眈向东窥望波兰。此时国际形势处于十分复杂而又微妙的状态。斯大林密切关注着各方的态度。对于英法等西方国家“祸水车引”的企图，斯大林十分担心。他深深知道，如果西方国家这一阴谋得逞，苏联不仅是同希特勒单独作战，而且是同得到英、法及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支持的希特勒作战，这种情况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为了避开希特勒进攻的锋芒，斯大林对希特勒进行了某些妥协来换取苏联对战争的准备时间。

正是在这一时期，朱可夫来到基辅特别军区，受命担任军区司令员。朱可夫一到任就积极开展工作。他走遍了军区几乎所有的部队和兵团，并在1940年夏秋两季，在基辅特别军区的部队进行紧张的战斗训练。当时在军区任作战部长，朱可夫在列宁格勒高等骑兵学校的学生——巴格拉米扬对朱可夫有一段精彩的描绘：

“15 年以来，朱可夫比其他同学更为一帆风顺。他有这样的成就我并不感到奇怪。在战前几年所有飞速提升的军事指挥员中，他无疑是最杰出的最有才能的人。我们一道在列宁格勒学习的时期，就数他不仅最有达到既定目的的铁一般的毅力，而且最有创见。在我们演习时，他经常有些出乎意料的表现使我们感到惊异，他做出的决定经常引起最大的争论，而他总能以少有的逻辑性来为自己作辩护。……和战前时期某些军事将领相对比，朱可夫不仅有军事才能，而且有坚强的性格，对不自觉的人他是不宽恕的。但他对下属的严格要求，很少表现为粗暴无礼，而这是那时不少军事首脑所特有的。只有百无一用的废物才觉得他可怕。朱可夫还有一个特点很突出，如果他想达到某个目的，他不是‘慢条斯理，小心谨慎，迂回曲折’，而是笔直向目标前进的。”

朱可夫的工作也得到当时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赞赏。赫鲁晓夫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谈到他对朱可夫的看法，他说：“朱可夫接替铁木辛哥使人十分满意。他是一位天才的组织者和强有力的领导人。他在战争中的表现是有气概的。可惜的是，像铁木辛哥和朱可夫这样的人是少数。在老的近卫军被清除以后，像麦赫利斯、夏坚科、库利克这样的人跑了上来，国防人民委员会成了病狗窝。麦赫利斯就是那些最糟糕的人中间的一个。”

朱可夫很快在野外作业中发现，担任集团军、兵团及司令部领导职务的都是比较年轻的军官，才从较低的职务提升上来不久。因此，战役战术基础很差，尤其对现代战争了解甚少，而对旧的教科书上的条条框框奉若神明。对此朱可夫

深表忧虑。

这一时期，朱可夫开始大胆地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一些敏感问题不避不让。他对军队中的政委制提出不同看法。他告诫说，军事胜利只有经过红军指挥员和政工人员的艰苦工作才能取得。他建议实行单一首长制。朱可夫成了对这个问题带头的最敢于说话的倡导者之一。

朱可夫很有预见性地提出，复杂的国际局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应在复杂的国际舞台上防止有人（指德国人）“耍花招”。他明确提出，签订互不侵犯协定主要是用来争取时间，必须要让西部的红军保持完全动员状态，以免被敌人打得措手不及。

1940年9月，朱可夫接到总参谋部的通知，让他参加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高级指挥员会议，并指定他在会上作题为《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的报告。通知还说，会议期间，将进行大规模的战役战略演习，指定朱可夫为演习中的“蓝”方。

这场演习作为战略情况基础而假设的事件是在苏联遭到德国进攻时西部边界可能发生的情况。“蓝”方（德军）假设是进攻一方；“红”方（红军）假设是防御一方。“蓝”方60多个师，“红”方50多个师。

演习充满了戏剧性情节，朱可夫指挥的“蓝”方部队，在演习中取得了胜利。而“红”方所遇到的情节与1941年6月21日苏联遭德国进攻后所发生的一些情况在很多方面很相像。

演习后，斯大林把总讲评安排在克里姆林宫进行。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各军区司令员及参谋长均

被邀请到克里姆林宫。除斯大林外，出席讲评的还有政治局其他成员。可见这次演习受到斯大林的高度重视。

演习讲评后的第二天，斯大林把朱可夫叫他那里，对他说：“政治局决定解除梅列茨科夫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你接替他。”朱可夫对这一决定感到突然，他一下不知如何回答。

“我从没有在司令部工作过。我一直在部队里。总参谋长我干不了。”朱可夫沉默了一会儿说。

“政治局决定任命你，你应该服从。”斯大林严肃而期待地说，他把重音放在“决定”两个字上。朱可夫从斯大林的语气中意识到，这是最高统帅已决定的事，任何反对都无济于事。朱可夫立即表示，感谢最高统帅对他的信任，然后说：

“好吧，如果发现我不是一个称职的总参谋长时，我将请求再回部队。”

“好的，我们谈妥了，明天中央颁布命令。”斯大林说。1941年1月31日，朱可夫正式出任苏军总参谋长。

朱可夫一到任就立即投入工作。整个2月份，他集中精力仔细研究了与总参谋部活动有直接关系的档案资料。每昼夜工作15到16个小时，常常在办公室过夜。这主要是因为朱可夫自认为不熟悉总参谋部的工作。以他的工作作风，他决不允许自己对工作一知半解。

经过研究，朱可夫发现军事理论已经符合时代要求，但是实践却落后于军事理论。尤其像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防御方面，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总参谋部的人告诉他，他的几个前任也都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但没有被足够重视。

这一时期，大量的德军集结在东普鲁士、波兰和巴尔干，引起了朱可夫的极大不安。更使他不安的是，西部各军区都缺乏足够的战斗准备。

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尽了最大的努力推动苏军的改革，然而时间却成了主要问题。原来的有关战前的军队作战计划、动员计划和战役战略展开计划都必须修改和重新制定。早在1940年秋天，就对原来的作战计划作过重大的修改，使之更加符合一旦遭到袭击时必须完成的任务。但计划存在有战略上的错误，这是由一个不正确的论点造成的。

当时认为最危险的战略方向是西南方向的乌克兰，而不是西部方向的白俄罗斯。事实上1941年6月希特勒统帅部正是在白俄罗斯方向集中使用了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集团。正是白俄罗斯方向距离首都莫斯科最近，从这里进攻符合希特勒摧毁苏联的闪电战术。

然而斯大林则认为，如果希特勒对苏联进攻，那么首先是力图占领乌克兰和顿涅茨河流域，以夺取苏联最重要的经济地区，掠夺乌克兰的粮食、顿涅茨克的煤，然后是高加索的石油。斯大林甚至在1941年春天审查作战计划时说：“没有这些最重要的资源，德国法西斯就不可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争。”

对于斯大林所具有的威望，当时是没有任何人想去怀疑他的，其中包括朱可夫。因此在1941年春天修订作战计划时，这一战略上的错误没有完全被纠正，也没有在西部方向部署更多的兵力。

苏联的计划执行得太慎重太缓慢。而此时的德国正加紧

准备进攻苏联。到 1941 年 5 月 5 日，德军已有 103—107 个师集结在波罗的海到黑海全线。6 月 1 日德军增加到 120 个师。截至 1941 年 6 月，德国军队比 1940 年增加 355 万人，总数达 850 万人，即 214 个师。而苏联到 6 月份，连同征召的补充兵员在内，共有 500 多万人。

朱可夫经过数次报告，最终得到斯大林的批准用野营集训的名义往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增调两个简编的合成集团军。斯大林特别要求军队极其谨慎，并采取战役伪装措施。但由于运输力量不足，部队调运工作进行得太慢。铁路车辆仍然按和平时期的时刻表运行。

此时的斯大林一直抱着这样一个愿望，战争能避免则避免，实在避免不了则尽量往后拖。要尽一切可能的办法避免德国在 1941 年秋季以前进攻，到了那时德国要在这一年发动进攻已经太晚了。

然而斯大林犯了一个时间上的错误，而且在这一时期斯大林发展了一种病态的猜疑心理，他认为战争爆发还有相当的时间。1941 年 4 月底，英国首相丘吉尔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密信说：“我从可靠方面获得确定消息，当德国人断定南斯拉夫已落入他们的掌心以后，即 3 月 20 日，便开始将驻在罗马尼亚的五个装甲坦克师中的三个师调往波兰南方。而当他获悉塞尔维亚发生革命时，又取消这一调动。阁下会很容易看出这些事实的意义。”

对于丘吉尔的暗示，斯大林是不相信的，他反而认为，英美政府竭力怂恿德国对苏联作战，此信是为了挑拨苏德交战。丘吉尔对此大为不满，他评价说：“从 1940 年 9 月到 1941 年

7月希特勒发动进攻为止，斯大林确实是一个既感觉迟钝又反应灵活，同时掌握情况很差的巨人。”

为了避免战争，斯大林甚至不惜讨好德国人。1940年4月，斯大林到火车站为日本外交部长松岗泽右送行。在与德国大使握手时，他亲昵地拍着德国大使的肩膀，请他帮助保持德国和苏联的友好关系。在斯大林的指示下，苏联的宣传媒介也统一对德国保持友好的口吻。

朱可夫在晚年回忆时，承认：“我应该做较为艰难的努力来说服斯大林，使他明白即将发生的事情。也许我没有以有足够说服力的方式向斯大林证明有必要使部队处于戒备状态，对这一事实我是不能推卸责任的。”但他随后又补充说：“可能在这方面我对他也起不了多大影响，我只能劝说，最后的决定，自然还得斯大林来做。”

事实上，朱可夫任总参谋长期间做了大量的战争准备工作，是功不可没的。5月中旬，朱可夫总参谋部制定了一个补充作战计划。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计划。计划要求在宣布动员后的几天内立即向边境军区迅速增援。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危急关头，斯大林仍然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

1941年6月13日，铁木辛哥当着朱可夫的面给斯大林打电话，要求批准下令边境军区部队进行战斗准备，并根据掩护计划展开第一梯队。

斯大林回答说：“让我再考虑一下。”

第二天，朱可夫又到克里姆林宫，当面向斯大林报告自己的不安心情，再次请求必须使部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斯大林说：“你们要进行全国动员，立即把部队调往西部

边境吗？这就是战争！你们懂不懂？”

随后，斯大林到底还是问：“我们在波罗的海沿岸军区、西部军区、基辅军区和敖德萨军区部署了多少个师？”

朱可夫立即报告说：“截止到6月1日，西部边境4个军区总共有149个师零1个独立步兵旅。其中……”

斯大林打断他的话说：“你看，这难道不少吗？根据我们的情报，德国人还没有这么多的部队。”

朱可夫解释说：“根据情报，德国师是按战时编制齐装满员的，一个师编有1.4万到1.6万人；而我们的师，还有8000人的师，实际上我们的师在人数上比德国的师少一半。”

斯大林却说：“不能完全相信侦察……”

6月21日晚上，朱可夫接到基辅军区参谋长的电话，报告有一名德军的司务长向苏军边防部队投诚，据这位司务长说，德军正在进入出发地域，将在22日晨发动进攻。

朱可夫立即向斯大林作了报告。随后，他奉命带上给部队命令的草稿，同铁木辛哥和瓦杜丁一起赶赴克里姆林宫。他们三人在路上商定，无论如何也要做出使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的决定。

斯大林表情忧虑地问道：“这个投诚者不会是德国将军为了挑起冲突而派来的吧！”铁木辛哥否定了这种可能性。

这时，政治局委员们都走进斯大林办公室，斯大林简要地说明了情况，问道：“我们该怎么办呢？”没有人回答他。

朱可夫说：“应该立即命令边境军区所有部队进入一级战斗准备。”随后他把草拟的命令稿念了一遍。

斯大林说：“现在下达这样的命令还太早，也许问题还可

以和平解决。命令应该再简短一些，指出袭击可能从德军的挑衅行为开始。边境军区部队不要受任何挑衅的影响，以免问题的复杂化。”

斯大林终于同意命令签发，铁木辛哥和朱可夫立即在上面签了字，并马上向各军区转发。1941年6月22日零时30分备战命令下达完毕。

从克里姆林宫出来，朱可夫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终于在这一天批准了各边境军区部队进入战斗准备的命令，以使用最充分的准备迎接迫近战争威胁。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动员和作战方面的组织措施，尽可能地巩固那些必将最先投入战斗的西部各军区。但另一方面，德军早上就可能转入进攻，而苏军还有许多最重要的措施没有完成。这就可能使这场与有经验的强大的敌人的战争极端复杂化。总参谋部刚才给各军区下达的命令，可能已为时过晚。

八、德军不是不可战胜

1941年6月21日夜，总参谋部和人民委员部全体人员都留在各自的工作岗位，紧张的气氛让人透不过气来，虽然谁也不知道战争会在哪一时、哪一刻爆发，但战争就在眼前。朱可夫整夜都在和各大军区司令及参谋长取得联系，时间显得格外可贵。

6月22日凌晨3时零7分，黑海舰队发现有大量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向苏联海岸接近。3时30分，西部军区报告，德军空袭了白俄罗斯的城市。三分钟后，基辅军区报告，乌克兰的城市遭到空袭。3点40分，波罗的海沿岸军区报告，德国飞机空袭考那斯和其他城市。

战争终于爆发了！

朱可夫立即给斯大林打电话。电话要通了，很久没人接。他不断地要，他简直不愿相信此时值班人员还会在睡大觉，终于他听到了保卫部值班将军带着睡意的声音。朱可夫马上说：“我是总参谋长朱可夫。请你立即去请斯大林同志接电话。”

“什么？现在？！斯大林同志在睡觉。”对方惊异地说。

朱可夫强压怒火，大声命令道：“请立即去，德国人正在轰炸我们的城市！”

三分钟后，斯大林拿起电话，朱可夫简短地报告了德军轰炸苏联各城市的消息，并请求允许开始还击。斯大林沉默

不语，这个不幸的消息来得太快、太突然了。

“你听懂了我的意思吗？”朱可夫急了。

仍然是一阵沉默，朱可夫从听筒里可以听到斯大林的呼吸声。最后斯大林才问：“国防人民委员在哪里？”朱可夫回答说：“铁木辛哥同志在同基辅军区通电话。”

随后，斯大林命令朱可夫和铁木辛哥立即到克里姆林宫，政治局委员也被同时召集在那里。斯大林脸色苍白地坐在桌旁，看到人到齐后说：“应该立刻给德国大使馆打个电话。”但警卫却进来报告，德国大使冯·舒伦堡格勋爵要求接见，他带来了紧急通知。斯大林指定莫洛托夫负责接见。这时，副总参谋长瓦杜丁打电话来，报告经过猛烈的炮击以后，德国陆军已在西部和西北方向许多地段向苏联进攻。

没过一会儿，莫洛托夫匆匆走进办公室，心情沉重地说：“德国政府已向我国宣战。”

斯大林再次沉默不语，一阵长时间的沉寂。朱可夫终于忍不住打破沉默，建议立即用各边境军区所有兵力猛烈还击突入的敌军，制止其继续前进。“不是制止，而是歼灭。”铁木辛哥补充说。斯大林疲惫地说：“下命令吧。”

7 时 15 分，国防人民委员的第二号命令发布了。但根据力量对比和已经出现的情况，这个命令明显不可能执行。由于通信系统完全失灵，朱可夫甚至无法从各军区司令部得到正确的情报。他站在总参谋部的作战大厅里心急如焚。

上午 9 时，斯大林再次接见了朱可夫，批准了朱可夫提出的实行全国总动员和成立统帅部的命令。最高统帅部由斯大林、铁木辛哥、朱可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

和库兹涅佐夫组成，铁木辛哥任最高统帅部主席。同时，波罗的海沿岸特别军区、西部特别军区和基辅特别军区，相应地改组为西北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24日，又组建了北方方面军、南方方面军）。西北方面军由库兹涅佐夫上将指挥；西方方面军由帕夫洛夫大将指挥；西南方面军由基尔波诺斯上将指挥。

中午，斯大林给朱可夫打电话说：“我们各个方面军司令员缺乏足够的作战指挥经验，看来有点发慌。政治局决定派你到西南方面军担任统帅部代表。你必须马上飞往基辅，会同赫鲁晓夫到设在捷尔诺波尔的方面军司令部去。”

朱可夫只给家里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妻子不要等他。仅40分钟后，他已经乘上了飞往基辅的飞机。在飞机上朱可夫才发现，已整整24个小时没吃任何东西。他太紧张了。

当日黄昏，朱可夫赶到基辅，赫鲁晓夫正在等他。赫鲁晓夫建议他改坐车去捷尔诺波尔，因为德国飞机已经取得了制空权，乘飞机太危险了。朱可夫听从了这位老朋友的安排。

朱可夫到达西南方面军司令员基尔波诺斯的指挥所时已是深夜了，他立即同瓦杜丁通了电话，以了解其他各方面军的情况。

瓦杜丁报告说：“总参谋部到现在为止仍无法从各方面军和空军司令部获得准确的情报。就是得到的情报也矛盾百出。现在还无法和库兹涅佐夫取得联系；他们没有向铁木辛哥元帅报告就跑到某个部队去了，连这两个方面军司令部也不知道他们的司令员目前在什么地方。”随后，瓦杜丁告诉朱可夫，斯大林同意了国防人民委员第三号命令，并叫签上朱可

夫的名字。这个命令要求苏军转入反攻，粉碎主要方向上的敌人，并向敌国领土挺进。

朱可夫对各军区司令的表现感到气愤。也对斯大林的这个第三号命令不理解。他急忙说：“是否能在天亮前把前线发生的情况搞清楚，然后再定下必要的决心。现在我们甚至还不能确切知道敌人在什么地方以多少兵力实施突击，我们怎样转入反攻。”但朱可夫明白，事情既然已被斯大林定下来，再改变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好吧，签上我的名字吧。”朱可夫无可奈何地告诉瓦杜丁。他清楚地知道这项命令必将遭到反对，各方面军都不具备执行这个命令所需的兵力兵器。但命令是必须要执行的。在朱可夫的建议下，实施反突击。突击对象首先针对突入索卡利地区的敌人“南方”集团军群的主要集团。朱可夫决定集中所有的机械化军、航空兵和部分统帅部远程轰炸航空兵参加这次突击。

朱可夫亲自赶到担任主攻任务的机械化第八军，军长利亚贝舍夫是他的老部下。6月24日，按照统一部署，机械化第八军在别烈斯帖奇科方向转入进攻；机械化第十五军在腊迭霍夫以东进攻。这两个军的出色战斗，使德军第一装甲集群的第四十八摩托化军陷入十分危急的境地。德军不得不动全部空军到这一地域抗击苏军的反突击，才使第四十八摩托化军免遭全军覆没。

就这样，西南方面军胜利地实施了对法西斯德军的最初的一次反突击。朱可夫后来不无遗憾地说：“要是方面军司令员手里有更多的航空兵用来与机械化军协同动作，要是再多

1—2 个步兵军，那么反突击可能会更加强大有力。”

经过极其残酷的战斗，苏军虽未能全歼这一地区的德军并停止其进攻，但达到了主要目的，那就是将指向乌克兰首府基辅的德军突击集群阻止在勃罗得——杜勃诺地区并加以削弱。由于朱可夫强有力的指挥与第八、第十五、第十九三个机械化军的卓越表现，使德军迅速突进到基辅的计划，遭到严重挫折。

德军第三坦克集群司令霍特后来回忆说：“南方集群处境最为困难。在我左翼兵团方面防御之敌虽被从国境击退，但很快就从遭受突然袭击中恢复过来，用预备队和配置在纵深的坦克部队实施反冲击，阻止了德军前进……敌人强大的反突击是德国部队进攻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然而，就在西南方面军取得一些战果时，西方方面军和西北方面军的情况则十分危急。这两个方面军的司令员、司令部仍没有同各集团军司令员建立稳定的通信联络。各师、各军不得不彼此孤立地作战，缺乏同友邻部队、同航空兵的协同动作，缺乏上级的及时的指挥。德军大量装甲坦克部队和摩托化部队已在西方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许多地段上完成了突破，并在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迅速推进。

苏军全线在退却，形势相当严峻。6月26日，斯大林命令组成预备队方面军，编有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集团军。而此时，西方方面军则遭受了重大损失，他们面对的是德国的著名坦克专家古德里安大将。方面军司令帕夫洛夫指挥的第三、第十、第四集团军在向明斯克退却时，不断遭到德国空军和装甲部队的袭击，在节节败退中，损失

惨重。

当日中午，斯大林打电话给在西南方面军的朱可夫说：“西方方面军形势严重，我不明白帕夫洛夫是怎么啦。库利克元帅不知道在哪里。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生病了。你能不能马上飞到莫斯科来？”

当朱可夫飞抵莫斯科时已是当天深夜了。朱可夫直接从机场去见斯大林。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铁木辛哥和瓦杜丁也等在那里。

斯大林直截了当地说：“请你来一起考虑一下，并且请你谈谈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做些什么？”

朱可夫请求给予 40 分钟的时间研究一下。他和铁木辛哥、瓦杜丁来到隔壁房间讨论西方方面军的形势。朱可夫从中了解到，由于方面军司令员帕夫洛夫既不确切知道第三、第十和第四集团军的情况，又不完全了解突入的敌坦克集团的情况，往往下达不符合情况的命令，致使第三和第十集团军余部被合围于明斯克以西，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第四集团军则已退入普里皮亚特森林中。

经过讨论形势以后，朱可夫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建议使用预备队方面军立即在西德维纳——波洛茨克——维捷布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莫济里一线占领防御以外，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朱可夫建议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建立纵深梯次防御，以疲惫敌人，将其阻止在某一防御地区，然后集中必需的兵力（一部分从远东抽调，主要靠组建新部队），组织反攻。但将德军阻止在哪里？哪里是合适的反攻出发地区？有多少部队用于反攻？这些全都是未知数，当时它

只不过是一种设想。

经斯大林批准后，朱可夫立即给西方方面军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赫将军传达统帅部的命令。要求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尽快找到所有的部队，使部队得到一切作战必需品。

朱可夫指示指挥员们要更大胆些，只要能掌握到部队，特别是坦克部队，就可实施歼灭性的突击。如能对敌机械化部队实行夜间进攻，必将取得特别重大的胜利。他还命令，组成独立的小群骑兵，由忠诚勇敢的中级指挥员负责指挥，派往所有的道路上，对德军及其后方机关展开大胆而广泛的袭击。

但西方方面军所有地段的形势仍在恶化。尽管方面军的各级官兵表现得非常英勇，6月29日明斯克最终失陷了。

6月30日，当朱可夫再次通过“博多”式电报机同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帕夫洛夫进行联系时，朱可夫愤怒地发现司令员本人对方面军的情况仍了解很差。朱可夫甚至不得不去证实一些从德国广播中得来的消息。斯大林两次来到国防人民委员部和统帅部，对西方方面军的形势极为不满。当天朱可夫授命召回帕夫洛夫大将。第二天，当帕夫洛夫回到莫斯科时，朱可夫已几乎认不出他来。在短短的8天时间里他像是变了一个人。

就在当天，帕夫洛夫被解除了方面军司令员的职务，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根据西方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建议，同时送上法庭的还有参谋长克利莫夫斯基等另外几位将军。这些将领经法庭审判后全部被枪决。

为了加强西方方面军，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被亲自担

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中将为副司令员，同时编入了预备队方面军的几个集团军。

根据西北方面军的情况也在继续恶化，西北方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被解职，由索别尼科夫少将接任，瓦杜丁被任命为方面军参谋长。

8月8日，斯大林被任命为最高统帅。

在整个7月份，苏军各个战略方向上的形势更加恶化，新一轮战斗来临了。虽然大量来自内地军区的兵团投入战斗，但苏军仍无法建立稳定的正面战略防御。

正在这时，铁木辛哥指挥西方方面军进行比亚斯斯托克——明斯克会战，由于德军兵力上占绝对优势，特别是在决定性上拥有3—4倍于苏军的兵力。西方方面军很快陷入了德军的重重包围中，会战遭到惨重失败。7月9日，会战结束。铁木辛哥率领的西方方面军主力被歼，其中第三、第十集团军全军覆没。刚补充投入战斗的第十三集团军损失2/3。据德军的统计，苏军在这次会战中损失火炮1809门，坦克3332辆，被俘323898人，其中有不少军人和师长。

西方方面军的失利，使苏德战争上的兵力兵器对比，变得更加有利于德国。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德军已深入到苏联腹地500到600公里，夺取了大批重要的经济地区和战略要地。

7月底，朱可夫和铁木辛哥被紧急召见。朱可夫以为是研究下一步的行动。但当他们来到斯大林的别墅时，发现几乎全部的政治局委员都坐在那里。斯大林站在屋子的中央，手里拿着已经熄灭的烟斗。朱可夫知道这是他心情不好的征兆。

朱可夫有点儿忐忑不安。

“是这样的，”斯大林说：“政治局讨论了铁木辛哥担任西方方面军司令员期间的工作，决定解除他的职务。有人提议由朱可夫担任这一职务。你们有什么意见？”斯大林转身询问朱可夫和铁木辛哥。铁木辛哥默不作声。

朱可夫只得说：“斯大林同志，我认为更换方面军司令员会严重影响到战役的进程。司令员还没有来得及熟悉情况，就不得不指挥困难的战役。铁木辛哥元帅指挥方面军还不到四个星期。他在会战中做到：处在他的地位所能做的一切。我想，任何人也无法做更多的事情。部队信任铁木辛哥，而这是主要的一条。我认为，现在解除他的职务是不公正的，也是不适当的。”

在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的附和下，斯大林勉强同意了朱可夫的意见。铁木辛哥被重新命令回到前线指挥西方方面军。

这一时期，由于西线的战斗暂趋沉寂，朱可夫开始注意到德军在列宁格勒上的举动。德军始终保持在列宁格勒方向上的进攻，虽然没有一举突破防御，但距离列宁格勒越来越近。经过分析，朱可夫认为，对莫斯科的进攻，敌人只能等到消除了苏联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向上部队对其中央集团军群翼侧的威胁以后才会开始。西北方向的敌人加强自己的部署之后，将力求在最短期间夺取列宁格勒，以便同芬兰军队会合。朱可夫经过反复权衡利弊，深信自己的预见不仅正确，而且为了保住列宁格勒，必须在某些地区作出让步，以集中兵力建立新的防御。

7月29日，朱可夫打电话给斯大林请求接见，在得到许

可后，朱可夫带着一张战略形势图、一张德军部署图，以及关于苏军状况和物质技术储备的材料，来到斯大林的接待室。

斯大林的秘书让朱可夫等一下苏军的总政治部主任麦赫利斯。提到麦赫利斯，他主要负责从7月份开始实行的政委制，而单一首长制则被取消。麦赫利斯以前还是在红军政治部进行军队大清洗者之一。对此朱可夫对此人感到厌恶，但也没办法，作为斯大林身边的红人儿，朱可夫只能对他敬而远之。

10分钟后，朱可夫被允许进办公室，麦赫利斯已经在里面了。斯大林说：“来吧，现在可以报告你的想法了。”

朱可夫把精心准备的材料摊在桌上，详细报告情况。他列举了各个方面军基本损失的数字，报告了编组预备队的进程，详细指明了德军的位置及其部署，分析了德军可能在近期采取的行动。

“你从哪里知道德军将如何行动的？”麦赫利斯首先硬地打断朱可夫的讲话。

“我不知道德军的行动计划，”朱可夫不耐烦地回答说：“但是根据对情况的分析，他们只能这样，而不会有别的做法。我的推测是根据对敌重兵集团首先是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的状况和部署的分析作出的。”

“继续讲下去吧。”斯大林说。

随着朱可夫对形势的分析，斯大林开始警觉起来，他迫不急待地问：“你的建议是什么？”

“加强中央方面军，至少给它增加三个集团军：从西部方向、西南方面军和统帅部预备队各抽调一个集团军……”

“怎么！你认为可以削弱莫斯科方向吗？”斯大林问。

“我们可以从远东抽调至少八个师，其中包括一个坦克师。这样就不是削弱而是加强莫斯科方向。”

“那么把远东送给日本人？”麦赫利斯又一次挖苦地说。

朱可夫没有再理他，继续讲下去：“西南方面军必须立即全部撤过第聂伯河。在中央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接合部后面，应集中不少于五个加强师的预备队。它将形成我们的拳头，好伺机打出去。”

斯大林盯着朱可夫问：“基辅怎么办？”

“基辅不得不放弃。”朱可夫毫不犹豫地回答。一阵难堪的沉寂，朱可夫知道作为军人“主动放弃”意味着什么。他看了一眼斯大林的脸色继续说：“在西部方面需要组织反突击以夺回敌方的叶利尼亚突出部。敌人将来可能利用这个桥头堡来进攻莫斯科……”

“哪里还有什么反突？真是胡说八道，”斯大林终于沉不住气，勃然大怒道：“把基辅交给敌人，亏你想得出来。”

朱可夫实在忍耐不住了，几天来的心血不仅被毫无理由地驳回，而且有一种被羞辱的感觉。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那么还要他干什么。我请求解除我的总参谋长职务，把我派到前线去，我在那里可能对祖国更有好处一些。”

“如果你这样提问题，那么我们缺了你能行。”斯大林也在火头儿上说。

“我是一个军人，我和总参谋部是怎么想的，我就怎么汇报。我坚信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你先回去吧，过一会儿我们再叫你来。”斯大林稍稍平静一些说。

半小时后，朱可夫被再次叫进斯大林办公室。斯大林已经息怒了，他十分平静地说：“我们经过研究，决定解除你总参谋长的职务，由沙波什尼科夫接任，你仍然是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最高统帅部的成员。我想叫你去担任实际工作，你想去哪里？”

“我可以作任何工作，可以指挥一个师，一个集团军，一个方面军。”朱可夫倔强地回答。

“冷静些！你刚才汇报说要在叶利尼亚附近组织一次战役，那就请你负责这件事吧，我们任命你为预备队方面军司令员。”

一个小时后，朱可夫就动身前往设在格查次克的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此时他知道只有事实才能说服斯大林，他想自己只能在前线尽最大努力减少损失，给德军以尽可能大的打击，以证明自己的军事才能。

后来的事实的确证明了朱可夫是完全正确的，为了保卫基辅，苏德双方激战了一个半月，最后苏军遭到巨大的损失，由于斯大林不同意在紧要关头把部队从德军的包围中撤出，并命令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基辅。斯大林解除布琼尼司令员的职务，任命铁木辛哥接替他。然而到9月19日，基辅失陷。约有65万名苏军官兵被俘虏，大量物资装备被德军缴获。只有布琼尼、铁木辛哥和赫鲁晓夫等少数人在基辅陷落前乘飞机逃出基辅，幸免被俘虏。基辅的失败无疑由斯大林本人的过失造成的。

希特勒由于基辅的胜利而趾高气昂，他决定继续往前挺进，在进入冬季以前占领莫斯科。

此时的朱可夫正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他每天工作 20 个小时左右。朱可夫十分倔强，他要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同时针对苏联所处的紧急形势，必须在战场上有所作为。朱可夫为制定出周密的作战计划，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不仅察看地形、熟悉部队，而且亲自审问德军俘虏，了解德军的部署和官兵的士气情况。

8 月下旬，朱可夫的预备队方面军向叶利尼亚地区的德军发起进攻。战斗十分激烈。朱可夫动用了方面军所有的飞机、坦克、大炮和新研制的火箭炮“喀秋莎”。在朱可夫卓越的指挥下，苏军于 9 月 6 日攻占了叶利尼亚。这次战斗，苏军共歼敌近 5 个师，消灭德军约 5 万人。这是战争开始以来，苏军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苏军的士气大为提高。

斯大林很快打电话给朱可夫，指示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但由于德军的一次反击，朱可夫只得推迟一小时返回。虽然朱可夫知道斯大林对应召迟到是从来不容许的。

9 月 8 日傍晚，朱可夫回到莫斯科，他一直在路上考虑如何向斯大林解释迟到的原因。在克里姆林宫的门口，朱可夫被早早候在那里迎接他的卫队长带到了斯大林宿舍。

一见到斯大林，朱可夫就说：“斯大林同志，我迟到了一个小时。”

斯大林面带微笑地说：“不，是一小时零五分钟。”又说，“请坐，如果饿的话，请吃点东西。”随后，斯大林向朱可夫介绍了列宁格勒的情况。在那里陆上联系已被切断。芬军从

北面进攻卡累利阿地区，得到坦克第四集群加强的德军“北方”集团军群从南面向城市进攻……

“你对莫斯科方向的形势有什么看法？”斯大林转身问朱可夫。朱可夫知道，这次斯大林要通盘考虑各方面军的形势。朱可夫认为德国人如果不结束列宁格勒战役，不与芬军会合，未必能够在莫斯科方向上展开进攻。朱可夫最后说：“当然，希特勒可能会有另外的打算和计划。但不管怎样，我们在莫斯科方向上必须随时准备进行顽强的防御。”

斯大林听后满意地点点头，紧接着说：“你到列宁格勒去，接替伏罗洛夫指挥的方面军和波罗的海舰队。”

朱可夫感到很意外，但还是表示坚决服从命令，并准备完成任务。

“这很好。不过请你注意，”斯大林加重语气道：“你要飞过战线或者德国空军控制的拉多加湖方能到达列宁格勒。”

随后，斯大林写了一张便条，交给朱可夫说：“你把这个交给伏罗希洛夫，请他将方面军交给你指挥，然后让他立即飞回莫斯科。”斯大林又补充说：“关于你的任职命令，等你到了列宁格勒之后再下达。”

朱可夫知道此行的危险性，斯大林是无法保证他安全到达列宁格勒的，从斯大林的话中，可以听出对这次旅途的担心。

临行前，朱可夫只是请求允许带两三位将军一起去，到那里任用。斯大林批准他挑选任何一位将军。9月9日，朱可夫带领霍津中将、费久宁斯基少将（曾随朱可夫参加哈勒欣河战役）和科科佩夫少将乘专机飞往列宁格勒。

九、列宁格勒保卫战

列宁格勒（现叫圣彼得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有 300 多万居民，是苏联的第二大城市。1941 年 7 月希特勒决定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夷为平地，使其不能住人，“以免我们有必要在整个冬天养活那里的居民”。

事实证明当时的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元帅指挥很不得力。到 7 月初时，西北方面军原来的 30 个师就只剩下五个师兵员足额装备齐全，其他的师只有原兵员的百分之十到三十。而伏罗希洛夫却完全惊惶失措，他甚至亲自跑到前线，以求战死。

1941 年 9 月 10 日晨，天空乌云密布，云层很低，压得人透不过气。一架 LI—2 型飞机在一队歼击机中队的保护下从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起飞。在飞机上朱可夫对这样一个“良好”天气感到满意，天气给敌机起飞制造了困难。一下飞机，朱可夫就急着赶往列宁格勒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斯莫尔尼宫。

此时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正在举行会议，讨论一旦扼守不住列宁格勒，应采取哪些措施。大家提出的措施包括破坏列宁格勒的军事、工业及其他目标。很显然放弃列宁格勒已被认为是必然的事情。

朱可夫带着焦急的心情，把斯大林的信交给伏罗希洛夫。

伏罗希洛夫一句话没说，只是轻轻点点头。当天晚上，他就飞回了莫斯科。

朱可夫以非常坚决的态度宣布，结束会议，暂不采取任何放弃城市的措施。随后，朱可夫改组了方面军的领导机构，费久宁斯基被任命为副司令；霍津被任命为参谋长；第四十二、第八两个集团军司令员也被撤换了。

然而，局势变得更加紧张。德军加紧了进攻，由于方面军各个地段上都严重缺乏反坦克炮，德军开始不断逼近列宁格勒城市附近。德军陆军总参谋长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在‘北方’集团军群正面已显示出进攻列宁格勒的重大胜利，赖因哈特军地带内的敌人抵抗已开始减弱。”

形势要求朱可夫必须采取有效而坚决的措施。朱可夫首先着手在部队中建立严格的秩序和纪律，大大改进军队指挥。他颁布命令，凡是失职的都要处决。为了使命令具有威力，朱可夫逮捕和枪决了一批有叛国行为或擅离职守的军官和士兵。对一些不良风气弥漫的连队宣布解散，士兵重新分配。

9月13日清晨，朱可夫不得不将最后一个预备队——步兵第十师投入战斗。因为是最后一个，朱可夫下了很大的决心。直到14日晨，步兵第十师的突击使防御恢复了原态势。

很快，朱可夫发现德军在进攻中已不那么主动，对于苏军的每一次反突击和反冲击都很敏感，立刻减缓进攻速度。朱可夫认为德国统帅部并没有集中兵力在突击的主要方向上，而分散在宽大的正面。这正是组织积极的反机动措施的有利时机。

朱可夫在详细制定了列宁格勒的防御作战计划后，强调必须树立军民的必胜信念。他对他的前任在列宁格勒造成的一切越来越不满。

有一次，方面军工程处处长比切夫斯基正在向朱可夫报告防御阵地上的工事，朱可夫眼睛一边盯着墙上的城市防御工事地图，一边静静地听着。突然转过身问道：“把坦克放在彼特罗斯拉夫扬卡区干什么？”又说“你对我隐瞒了什么？这里有些问题。”

工程处处长不得不佩服朱可夫的眼力和敏捷的思维，他指着地图上表示坦克的标记说：“司令员同志，这是模型坦克。”随后不无得意地说：“我们在马里伊斯基剧院的道具车间造了 50 辆，德国人已经轰炸了它们两次。”

“这个把戏你们玩了多久了？”朱可夫面带嘲讽地说。

“两天！”

朱可夫带着辛辣的幽默感对工程处处长说：“德国人没那么傻，他们很快就会看穿这个把戏，就会用木头炸弹来炸这些模型坦克。”但随后他又命令第二天再造出 100 辆坦克，放在地图上指定的两个地方。工程处处长面露难色，他知道车间没法在一夜间造出这么多的坦克模型。

朱可夫不满地上下打量这位工程处处长说：“听到没有。你如果办不成就把你交付军事法庭审判。你的政治委员是谁？”

“团政治委员穆赫。”

“对了，还有他，如果不执行命令要把你们两人一起交付军事法庭。明天我亲自来检查。”

这位工程处处长吓得赶紧回去四处找人，硬凑了一批木匠，终于在黎明到来时完成了任务。他自己都惊奇这件不可能的事竟然完成了。

朱可夫就是这样时常用军事法庭来威吓那些军官，有些则当场被解职。军队的作风很快得到改善，部队的战斗力也明显增强。

此时，列宁格勒以南的筑垒地带大部分被攻破，最前面的德国装甲部队离城已不到7英里。9月15日，双方在乌里次克的争夺战更加激烈，苏军不间断地进行反突击，从德军手里收复刚丢失的阵地，许多阵地一天之中几次易手。德军明显感到苏军打得更加拼命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德军第十八集团军在斯特列尔纳和乌里次克之间突入芬兰湾，把苏军第八集团军与列宁格勒隔开，这样守卫列宁格勒的苏军就只剩下第四十二和第五十五集团军了。德军统帅部命令第十八、第十六集团军发动钳形攻势，拿出八个师对付第四十二集团军，拿出三个师对付第五十五集团军。德军已开始近距离围攻城市。

9月16日朱可夫为了防止德军通过乌里次克向列宁格勒突破，用一个新组成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步兵师、一个人民民兵师和两个水兵和各空防单位人员组成的步枪旅加强第四十二集团军。朱可夫下令，未经方面军司令部明确批准，部队不得撤出防线。在9月18日前，朱可夫又组成了五个步兵旅和两个步兵师，配备列宁格勒的四条近距离防线的兵员。这样他就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第二梯队，构成了作战的纵深防御。同时使用第八集团军来打击德军的后部和侧翼，并解放

姆加和什利谢尔堡。

在朱可夫拟定的整个城防计划中，要求动员这个地区的一切资源，包括方面军的部队，列宁格勒的居民和苏联海军，建立预备队，并增加防御阵地的纵深。他还大大依靠海岸炮和波罗的海海军舰艇的火力，由于阵线缩小，靠海越来越近，它们的火力就更有效了。

然而此时的朱可夫心中也没底。他已经做了他能做到的一切。但情况仍十分危急。朱可夫后来回忆说：“形势的发展，似乎看着就要发生我们每个人内心最害怕的事情。”

在方面军司令部，朱可夫和他的下属人员都在强大的压力下工作。在这种紧张气氛中，朱可夫显得态度生硬、烦躁。他虽然能保持对士兵的友好态度，但对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则大声训斥。

有一次，工程处处长比切夫斯基又一次灰头灰脸地从朱可夫办公室出来。在会客室碰到了费久宁斯基。费久宁斯基看到他的样子禁不住开玩笑道：“挨骂了吧，工程处长？”

“何止是挨骂。司令员说了，要是第六师清晨以前不进入环行路的防御工事，就要处决我。将军同志，看来您的司令部里就没有一个人关心把一师部队带入防线这样的小事，而事实上地图透明图已经交给您的集团军了！”比切斯基禁不住回嘴说。

“别发火，工程处长！你还算幸运的哩。就在刚才，他还说要把我们和军事委员一起绞死哩！我们已经决定你一来我们就走，我们想等你一会儿。我们知道司令员不会让你在那儿呆太久的。”

费久宁斯基的笑容使比切夫斯基踏实起来。他们一道投入夏末的夜，任务很快顺利完成了。

9月17日至9月23日，德军六个整师在空军的配合下发动猛攻，企图从南面突入列宁格勒城区。朱可夫下令反突击。激战了整整六个昼夜，德军才开始后退。

在这一期间，最高统帅部命令库利克指挥第五十四集团军在东侧组织突击，以增援列宁格勒方面军。这既可以援助列宁格勒的防御，并把“北方”集团军群的部分兵力从主要的普尔科沃地段吸引开，还可以打通到列宁格勒的路上运输线，收复姆加——施吕瑟尔堡地域，解除对列宁格勒的封锁。

朱可夫决定以一个师和涅瓦河战役集群一个旅的兵力同第五十四集团军相向进攻。虽然方面军已把所有的部队用到主要方向，每抽调任何一支部队，都可能给德军形成突破口，而将城市让给敌人。但朱可夫太需要物质供应了，他下了很大决心这样做。

令人遗憾的是库利克指挥的五十四集团军没有协同配合，迟迟不采取行动。朱可夫的部队在德军连续不断的火力下，强渡水势汹涌、宽达800米的涅瓦河，尔后穿过沼泽地和森林向敌人冲击。而库利克却胆小怕事，以德军转入进攻为由，拒绝向敌人进攻。朱可夫后来回忆道：“据我掌握的情况，库利克搞错了，敌人的行动不过是试图以火力侦察查明我防御情况。库利克竟然把敌人的每次侦察或小规模行动，都当成进攻，很显然他是不清楚或是不想去弄清楚列宁格勒的极端紧张的局势，他只关心第五十四集团军的安全。”

斯大林甚至给库利克打电报，提出“……不要拖延进攻

准备，要实施坚决的进攻，以便同朱建立联系”。然而第五十四集团军的进攻还是拖延了几天。

9月20日斯大林再次命令库利克立即行动：“21日和22日这两天，必须在敌人正面上打开一个缺口，并同列宁格勒方面军会合，再推迟就晚了。你太拖延了。必须弥补失去的时间，否则德国人就会把每个村庄都变成要塞，而你也就永远不能同列宁格勒会合了。”然而这一命令又没有得到执行。

9月29日，库利克被免职，第五十四集团军拨归列宁格勒方面军指挥。朱可夫不得不指派方面军参谋长霍津任第54集团军司令员。但战机已被延误了，朱可夫派去接应的部队受到重大损失后，退回涅瓦河。

朱可夫为了加强防御，把全城分为六个防御地段。每个地段都建立了以营防御区为基础的坚强阵地。在这些地段内共建立了99个营防御区。朱可夫要求必须在全城建筑路障，在城的周围挖掘防坦克堑壕。

为了完成这一庞大的建筑任务，平均每天有4500人参加工事的修筑。因为男人都当兵去了，这些基本是妇女干的。这些妇女生活十分艰苦，干活的妇女每天配给14英两面包，这些妇女所做的牺牲，是很难想象的。

朱可夫有一天视察城防工事。他走出汽车，来到一群正在干活的妇女中说：“你们挖得很好，姑娘们，挖得很好！”

有一位妇女，已经不年轻了，她直起疲惫的腰，倚着铁锹毫无笑容地回答道：“我们挖得好，可你们打得很糟。你们让德国人一直打到列宁格勒来了。”很显然她并没认出朱可夫来。

朱可夫认为这位中年妇女的话是对的，他无法更好地回答她，便问道：“你丈夫在哪儿？”

她答道：“在你们部队里……在跑！”她屏住一会气，然后拿着铁锹继续干活。

这件事强烈触动了朱可夫，作为军人，他认为这位妇女完全有理由责怪他。他敬佩这位妇女，时常用这件事教育属下的军官。

到9月底，德军终于相信，列宁格勒的防御十分坚强，以现有的兵力摧毁它是办不到的，德国指挥部决定用封锁的办法把城里的人饿死，然后将城市摧毁。

希特勒为此气得发疯。他命令：“关于彼得堡城（列宁格勒）的未来，要用封锁和不停的空袭及炮击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投降的要求将予以拒绝。”

朱可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到：“我感到无上光荣的是，在最危难的时刻，委任我指挥保卫列宁格勒城的所有军队。在被封锁的条件下，组织同兵力兵器占极大优势之敌的斗争，这对于我后来作为方面军司令员和副最高统帅的整个工作，都是非常有益的。1941年9月是我永生难忘的。”

直到1943年3月初，苏军开始全线反攻，歼灭列宁格勒周围的德军兵团。朱可夫被再次任命指挥突破列宁格勒封锁的战役，才彻底结束了长达三年零一个月的列宁格勒保卫战，这是后话。

尽管朱可夫从9月10日到10月7日仅在列宁格勒呆了20多天，但这次战役的胜利，他是功不可没的。列宁格勒保卫战不仅坚定了苏联人民必胜的信心，打击了德军的气焰，而

且牵制了德军的大量兵力和芬兰的全部军队，对其他方向战场形势的转变起了重大作用。

从9月底开始，列宁格勒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德军的攻势也逐渐减弱，后来被迫转为防御，采用围困的办法。9月17日德国撤走了摩托化及装甲部队，开始计划对莫斯科发动最后的大规模进攻。很显然时间对希特勒来说十分宝贵，离进入冬季的日子不多了。希特勒担心会成为拿破仑，使战争输在苏联寒冷的气候上。

1941年9月30日德军发起了对莫斯科的总攻。德军企图在维亚济马——莫斯科方向和布良斯克——莫斯科方向上消灭苏军，然后从南、北、西三面迂回莫斯科，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将其占领。为此，德军在莫斯科方向集结了180多万兵力，1700辆坦克和1390架飞机。同时，苏联有三个方面军保卫莫斯科：它们是西方方面军、预备队方面军和布良斯克方面军，总兵力约125万人，990辆坦克，7600门火炮和迫击炮，677架飞机。

10月初，德军开始实施代号“台风”的战役计划。西方方面军第十九和三十集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第四十三集团军在敌军由库科夫钦纳以北和罗斯拉夫尔以东发动的攻击中受到重创，德军突破了防线。他们迅速推进，从南北两方面包围了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布署在维亚兹马的所有部队。

布良斯克方面军正面遇上了德国坦克专家古德里安的部队。德军几乎没遇到任何真正的抵抗，就占领了布良斯克。当10月3日德国人的坦克冲入这个城市的铁路枢纽和工业中

心时，苏联人完全出乎意料，甚至电车还在行驶中。很快布良斯克方面军被切成两半，兵力也受到重创，被迫向东和东南撤退。

正在这危急时刻，10月6日晚，莫斯科地域下了冬天的第一场大雪，而且雪很快就融化了，泥泞的道路大大减缓了德军推进的速度。然而作为苏联首都的莫斯科，战略上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关系到整个苏联的命运。

1941年10月5日，斯大林打电话命令朱可夫尽快飞回莫斯科。由于当天晚上，第五十四集团军防御上出现重要情况，朱可夫推迟了原定10月6日回莫斯科的行程。10月6日傍晚，斯大林再次打电话给朱可夫强调说：“留下方面军参谋长霍津将军或者费久宁斯基代替你，请你自己乘飞机来莫斯科一趟。”

朱可夫告别了在列宁格勒共同战斗了20个日日夜夜的战友，飞往莫斯科。

十、莫斯科大会战

1941年10月7日晚，莫斯科已实行宵禁，大街上空空荡荡。一辆军用小轿车风驰电掣般地穿过宁静的街道，直奔克里姆林宫。朱可夫坐在车里思考着斯大林让他此行回来的目的。作为最高统帅部成员，朱可夫对莫斯科的情况很了解，他已预感到他肩上的重担。

来到克里姆林宫，朱可夫被告之斯大林病了，在他的住所里工作。于是，朱可夫又连夜赶往那里。

见到斯大林时，他的气色很不好，只是向朱可夫点了点头，用手指着墙上的地图有气无力地说：“你看，这里的情况很严重。我无法从西方方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得到有关真实情况的详细报告。由于不了解敌人进攻的地点和部署以及我军的情况，我们不能定下任何决心。现在请你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去一趟，详细弄清那里的情况，并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将等着。”

告别斯大林，朱可夫来到总参谋长沙波科夫元帅的办公室，这位元帅显得很疲惫，显然，形势让他伤透了脑筋。他告诉朱可夫：“斯大林同志已来过电话，命令为你准备好西部方面的地图。”随后传达最高统帅部的命令，派朱可夫到预备队方面军作为最高统帅部的代表。

朱可夫离开总参谋部，立即前往西方方面军司令部。为

了争取时间，在车上朱可夫用手电筒照着地图，研究前线的情况和敌我双方的行动。由于连续几天几夜没合眼，他不得不时常叫车子停下来，进行短距离跑步来打消睡意。

直到深夜，朱可夫才到达西方方面军司令部。所有的领导人员都在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的屋子里开会。朱可夫直接向科涅夫传达了最高统帅部的命令。参谋长马兰金汇报了10月2日至7日的情况，并回答了朱可夫提出的问题。

当朱可夫基本了解了西方方面军的情况后，立即打电话给斯大林，此时已是8日凌晨2时30分了。朱可夫汇报了西部战线的情况后说：“现在的主要危险是莫扎伊斯克防线兵力薄弱，因而敌人的装甲坦克兵有可能突然出现在莫斯科附近。应尽快设法从别处抽调部队增强防线力量。”

斯大林询问了西方方面军第十九、第二十集团军和预备队方面军的第二十四、第三十二集团军所在位置后问：“你打算做些什么？”

朱可夫坚决地回答道：“我现在去找布琼尼，他大概在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某个地方。”

“好，找到他后立即打电话给我。”斯大林很满意朱可夫的工作效率。

8日早晨，天下着小雨，大雾弥漫，能见度很低。经过普罗特瓦河时，朱可夫看到那熟悉的河岸和远处的奥布宁斯克车站，他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对于这一带的地形，他非常了解。

很快在一个小山上，朱可夫找到了最高统帅部代表麦赫利斯和方面军参谋长阿尼索少将。但从阿尼索那里得到的回

答是：“不清楚，白天布琼尼元帅到第四十三集团军去过。但现在我担心司令员会遇到什么不幸的事情。”

朱可夫很不满意他们所提供的情况，他只能继续往前走，以迅速察明部队的情况。

在小雅罗斯拉韦茨市中心，朱可夫终于在区执委会大楼附近发现了两辆小汽车。但整个城市已成了一片废墟，大街上空无一人。小汽车里的司机告诉朱可夫，这正是布琼尼元帅的车。他们也才刚到这里三个小时。

在区执行委员会大楼里，朱可夫见到了布琼尼，两人都很高兴能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他们互通情况后，朱可夫知道必须更进一步了解前方的情况。在尤赫诺夫地区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朱可夫乘车前往尤赫诺夫时，他不得时常将车停下来，仔细观察是否开到了敌占区。在一片森林里朱可夫遇到了独立坦克旅旅长特罗茨基，他很高兴见到他在哈勒欣河战役时的老部下，当时特罗茨基担任坦克十一旅参谋长。从特罗茨基那里知道，尤赫诺夫已经被德军占领，卡卢加地区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而特罗茨基的独立坦克旅却在这片森林里呆了两天，仍没有得到任务指示。

朱可夫立即命令特罗茨基派人和预备队方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同时把一部分坦克布署到前边组织防御。随后他告别了这位旅长，继续向卡卢加进发。然而半路上，方面军司令部的联络参谋追上了朱可夫，并交给他一份总参谋长的电话记录，斯大林要求朱可夫于10月10日赶到西方方面军司令部。

很快，朱可夫被任命为西方方面军司令员。布琼尼被召回，预备队方面军撤销后合并为西方方面军。科涅夫调往加里宁方面军。

斯大林对朱可夫说：“赶快把一切都抓起来干吧！你要尽一切力量不让德军突破莫扎伊斯克——小雅罗斯拉韦茨地区以及谢尔普霍夫方向的阿列克辛地区。”

朱可夫回答道：“我立即着手执行你的指示，但请求赶快把较大的预备队调到这里来，希特勒军队可能在最近增强对莫斯科的突击。”

10月7日开始从最高统帅预备队和友邻方面军调来了14个步兵师、16个坦克旅、40多个炮兵团和其他部队。重新组建了第十六、第五、第四十三和第四十九集团军。但总共只有9万人，要建立一道紧密而坚固的防御，这是远远不够的。

从10月13日起，在通向莫斯科的所有重要作战方向上都开始了激烈的战斗。当天朱可夫被迫放弃卡卢加。10月15日，德军的坦克部队在西方方面军防御的中部方向上完成了纵深突破。这样一来，就在距离莫斯科62到74英里的接近地上造成了极其严峻的局势，情况十分危急。

在整个10月，德军总共向前推进了230—250公里。但在苏军一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德军也被拖得精疲力尽，突击集团也拖得很散，进攻能力一天天减弱。

到10月底，德军的进攻被阻住。当时，加里宁方面军的防御也得以稳定。为此朱可夫付出了巨大的劳动。在方面军司令部，每个人都在不分昼夜地工作。由于疲劳和缺乏睡眠，

人们都几乎站不稳了。

11月1日，朱可夫被召回最高统帅部。斯大林对他说：“今年十月革命节，除了开庆祝大会外，我们还想在莫斯科举行阅兵式，你认为怎样？前线的形势允许我们这样做吗？”

朱可夫知道在这种最困难的时刻，斯大林的决定是有道理的，全军将士和全国人民此时最需要的就是必胜的信念。于是他回答道：“敌人在最近几天内不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在前一阶段的作战中，敌人遭到了严重损失，不得不重新补充兵力和调整部署。为了防备敌人可能进行的空袭，需要加强对空防御，把歼击航空兵从友邻方面军调到莫斯科来。”

11月7日，莫斯科上空飘着雪花，红场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战士们全副武装，雄赳赳、气昂昂地从列宁墓前走过，直接开赴前线。这件事对于巩固军队和苏联人民的士气起到巨大作用，并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在此期间，朱可夫在受威胁的地段上设置了纵深梯次配置的对坦克防御，构筑了防坦克支撑点和防坦克地域。苏德军队双方都作了新的调整和补充。德中央集团军群总兵力增加到74个师和4个旅。其中在西方方面军正面，就集中351个整编师，包括31个步兵师、13个坦克师和7个摩托化师。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也补充了10万官兵、300辆坦克和2000门大炮，总兵力达到35个步兵师、3个坦克师、3个摩托化师、12个骑兵师和14个坦克旅。

11月13日，朱可夫突然接到斯大林的电话。

斯大林说：“我同沙什尼科夫认为，应先于敌人进行反突击以粉碎敌人正在准备的突击。要在沃洛科拉姆斯克地区实

施第一次反突击，从谢尔普霍夫地区的德军第四集团军翼侧实施另一次突击。看来，敌人在那里集结了大量兵力，准备向莫斯科突击了。”

朱可夫大为吃惊，他很不理解在这种关键时刻，从哪里调用兵力实施这些反突击。他说：“我认为现在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把方面军最后的预备队投入到没有把握取胜的反突击中去。当敌人的突击集团转入进攻时，我们将无法巩固集团军的防御阵地。”

对于朱可夫的争辩，斯大林生气了，他武断地说：“关于反突击问题就这样决定了。今晚就将计划通知下去。”

朱可夫很快知道，斯大林对他的申辩不满，并认为他骄傲了。朱可夫无可奈何地下令，在两个小时以后，第十六、第四十九集团军实施反突击。但德军兵力相当强大，除了在少数地区取得较大效果外，整个突击行动没有取得最高统帅部所预期的效果。

但很快，德军于 11 月 15 日清晨向莫斯科发起了计划半个月之久的第二次进攻。双方展开了一场力量极不相衡的战斗。由于前一次实施的突击打乱了朱可夫的防御计划，并用掉了他最后的预备队。苏军兵力明显不足，实力薄弱。尽管苏联官兵打得极其顽强，但最终还是向后不断撤到新的防线。27 日，德军攻占了离莫斯科仅有 24 公里之遥的伊斯特腊，这是这次大战中德军所到达的离莫斯科最近的地点。这意谓着莫斯科已处在德军的大炮射程之内。

但随着德军的战线向前推进，战斗越来越激烈，德国部队已经被连续的战斗和严酷的寒冬弄得疲惫不堪。由于补给

品奇缺，特别是缺少冬装，衣衫单薄的德军士兵在零下 20 多度的冰天雪地里瑟瑟发抖，战斗力不断下降。种种不祥之兆开始在德军队伍中弥漫。

据统计，到 11 月 26 日止，东线德军有 24658 名军官和 718454 名士兵阵亡、受伤或失踪。东线军队缺员 34 万人。步兵兵力已消耗过半，每个连队的兵员仅有五六十人。

一天，当德军在加里宁方面军的第三十集团军的地段取得了战术突破后不久，斯大林忍不住打电话给朱可夫说：“你坚信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吗？我怀着内心的痛苦在问你这个问题，希望你作为共产党员诚实地回答。”

朱可夫坚定地回答：“毫无疑问，我们能够守住莫斯科，但是至少还需要增加 2 个集团军和 200 辆坦克。”

由于朱可夫的信心，斯大林最终没有放弃对莫斯科的决心。这段对话也被广为流传，这充分显示了朱可夫在最困难时所表现出的坚强毅力和他充满必胜信念的乐观主义精神。

12 月 5 日，德军终于失去了进攻莫斯科的信心。开始被迫退到纳拉河西岸。德军的“台风”进攻计划破产了。同时，也为苏军的反攻创造了时机。

朱可夫经过对形势的详细分析，认为此时的德军已极度虚弱，虽然德军兵力仍优于苏军，但战线拉得太长（达 1000 公里），两翼的突击部队相距 200 公里，兵力分散。而苏军兵力却比较集中。在这种时候，正是发动反攻的最佳时机，否则，德军从其“北方”集团和“南方”集团抽调强大的预备队来加强在莫斯科地区，那里局势可能会再度恶化。

朱可夫立即打电话给斯大林，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并呈

报了反攻战役计划。当天晚上，朱可夫就接到通知，斯大林已决定开始反攻。

1941年12月6日早晨，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从莫斯科南、北两面开始了反攻。几乎在同一时间，友邻方面军也分别在加里宁和耶列次地区向前推进。苏德双方展开了大规模的战斗。

经过10天的战场较量，已经削弱和极度疲惫的德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在苏军的压力下，节节向西败退。到12月16日，苏军已把德军赶出了加里宁、克林和耶列次。

希特勒气得大喊大叫，他命令前线部队禁止后退。同时，德南线部队司令官伦斯德、坦克集团军司令古德里安等重要高级将领纷纷被革职。为了防止出现“兵败如山倒”的残局，同一天，希特勒决定亲自担任陆军总司令。

在莫斯科会战中，在以朱可夫西方方面军为主力的苏军打击下，德军总共损失了50万人，1300辆坦克，2500门火炮，15000多辆汽车和很多其他技术装备。德军则被击退了150—300公里。苏军解放了11000多个居民点。

1942年2月和3月，最高统帅部要求在西部方向上加强进攻行动，但苏军这时各方面军的兵力和兵器都已大大地消耗了。当最高统帅部决定加强西线作战的各方面军力量时，已经迟了。希特勒已经大大加强了其维亚济马集团，并凭借预先构筑的阵地，开始组织积极的反突击行动。

朱可夫的西方方面军已精疲力尽，但仍然要不断克服德军越来越强的抵抗，继续向前推进。为此，朱可夫不止一次地报告建议停止进攻，巩固已夺得的地区，但斯大林断然拒

绝了这些报告和建议。相反，斯大林在3月20日又发出命令，要求朱可夫竭力去完成进攻任务。

事实再次证明朱可夫是正确的，苏军在遭受巨大伤亡后，不得不转入防御。莫斯科会战就此告一段落。

德军在莫斯科战役中的失败，是德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遭受的第一次大失败。它打破希特勒法西斯不可战胜的神话，也大大鼓舞了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斗争。莫斯科战役后，德军的有生力量大大削弱，而且从此开始走下坡路。而苏军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士气高昂。在莫斯科战役胜利的基础上，从1942年1月8日开始，苏军在全国范围内转入了全线总进攻。

朱可夫作为拯救莫斯科的英雄而名声大噪。斯大林高度赞扬了朱可夫，他在一次讲话中说：“朱可夫同志的名字，作为胜利的象征，将永不分离地同莫斯科会战联系在一起。”

朱可夫也在回忆录中说：“每当人们问我以往战争中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什么，我总是回答：‘莫斯科会战！’”

十一、斯大林格勒的转折

莫斯科冬天的冰雪和春天的泥泞,使德军吃尽了苦头。德军不可能再发动像 1941 年那样大规模的宏大战役。但希特勒绝不打算轻易放弃主动,尽管 1942 年兵力的不足使其活动的范围受到限制。

1942 年 4 月 5 日,希特勒下令将一切可用的军队集结到南翼的主要战线,其目的是在顿河地域消灭苏军,以夺取高加索油田,再向斯大林格勒推进。斯大林格勒的诱惑使希特勒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得到它,它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挑战。

斯大林格勒,原名察里津,后来又称伏尔加格勒,位于伏尔加河下游西岸,战前居民约 60 万。它是苏联南方的一个铁路交通枢纽和重要工业城市。同时是苏联的粮食、石油和煤炭的主要产区。1941 年,德军占领乌克兰以后,斯大林格勒成了苏联中央地区通往南方重要经济区域的唯一交通要塞,战略位置极为重要。

由于德军在整个冬季战斗中伤亡了 110 多万人,而且还不包括大量的病员在内,希特勒为弥补兵员的不足,不得不招募大量的“外国”部队。后来事实证明,协约国的部队作战素质极差,思想消极,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另一个方面加速了德军灾难性结局的到来:

此时,斯大林希望美国和英国能尽快开辟第二战场,甚

至在欧洲的其他地区能多少采取点行动，以减轻苏联的压力。但第二战场却迟迟未能开辟。

1942年5月12日，苏西南方面军集中了45个师，从南、北两个方面向哈尔科夫地区的德军发起强大攻势，想一举攻克哈尔科夫。开始三天，苏军进展顺利，突破了德军防线50公里。此时朱可夫建议停止前进，由于德军仍在数量上占优势，朱可夫一再反对同时展开数个进攻战役。但斯大林很坚决，他甚至以前三天的胜利谴责总参谋部的胆小怕事。直到5月17日，德军开始实施强大的反攻，斯大林才认识到突击的第六和第五十七集团军处境危险，决定停止进攻。但这个决定下得太晚，苏军很快进入被动局面，西南方面军副司令员科斯坚科将军，第六和第五十七集团军司令员和鲍勃金将军都牺牲了。

苏军在西南方向的形势一天比一天恶化了。在7月中德军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苏军被迫后撤了150至400公里，方面军的损失惨重，有24万官兵被俘虏，同时损失火炮2026门，坦克1249辆。德军已经进抵顿河大河湾，矛头直指斯大林格勒和北高加索地区。在整个苏德战场上，德军又夺回了部分战略主动权。

1942年8月27日，朱可夫被任命为副最高统帅。朱可夫接到任命不久，斯大林就打来电话说：“你必须尽快到最高统帅部来。留下参谋长代理你的工作。请考虑一下，任命谁来接替你担任方面军司令员。”通话就这么结束了，斯大林在电话里没有说明任何情况。朱可夫想这可能是件很重要的事，不便在电话中谈。

朱可夫立即前往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和国防委员会委员已经等在那里。斯大林简单介绍了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情况。随后宣布朱可夫为副最高统帅并派往斯大林格勒地域。

朱可夫请求用一昼夜的时间研究情况。8月29日飞往斯大林格勒。

在斯大林格勒，朱可夫通过实地调查并和前线指挥共同讨论断定，正在集中的各集团军直到9月6日才能做好突击准备。在斯大林的命令下，9月5日早晨，苏军在炮兵和航空兵的火力掩护下，发起了冲击。但德军的抵抗非常顽强。经过一天的激烈交战，苏军进展甚微。

朱可夫很快发现以现有的兵力很难突破敌人的战斗队形并消除其走廊。由于在兵力上没有足够的优势，苏军在斯大林格勒地区的突击只能蒙受沉重的损失。朱可夫反复巡视了各集团军的部队，更加坚信他的结论是正确的。

9月12日，朱可夫奉命飞往莫斯科，汇报斯大林格勒前线形势。斯大林询问有什么别的解决办法没有。朱可夫一时无法回答，他请求给予一天的时间研究一下。

第二天，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在总参谋部工作了整整一天。他们几乎考虑了各种方案。最后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有无实现一次大规模战役的可能性上。这样就必须避免把正在编组和已经编组好的预备队消耗在局部性战役中。这次大规模的反攻将在斯大林格勒围歼德军，从根本上改变南部战略形势。

晚上，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来到最高统帅部，把设想的斯大林格勒地域反攻计划草案地图送到斯大林面前。斯大

林显得有些吃惊地问：“现在有足够力量实施这样大规模的战役吗？”

朱可夫充满信心地说：“根据我们的计算，过 45 天，我们就会具备必要的兵力和武器，而且完成准备工作。”

斯大林仍心中没底，他问：“我方突击集团调动的距离是不是过远了？”

朱可夫解释了战役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突破德军防御，合围德军斯大林格勒集团并建立牢固的对外正面，以隔绝该集团与外部敌人的联系；第二阶段，歼灭被围敌人并制止敌人解围的企图。然而朱可夫并没有完全说服斯大林，斯大林随后说：“这计划还应更好地考虑一下，还要计算一下我们的后备力量，现在的任务是守住斯大林格勒。”

很显然，斯大林对第一次大规模合围德军是缺乏信心的。正巧这时东南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从前线打电话来说，德军正向斯大林格勒市区方向调动坦克部队，明天德军就可能发动新的突击行动。

斯大林当即终止了谈话，并命令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前往斯大林格勒。分手之前斯大林强调：“关于计划，以后我们再继续谈，除我们三个人外，目前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果然，德军攻打斯大林格勒市区的战斗于 9 月 13 日打响了，这场残酷而激烈的战斗一直持续了两个月。直到 11 月 18 日结束。交战双方都投入了相当多的兵力。德军共有 50 个师，其中用来直接进攻市区的有 13 个师，共 17 万人，他们拥有 500 辆坦克，1700 门大炮和迫击炮。而苏军虽有 120 个师，但人员编制严重不足，有的师仅有 800 人，实际防守市区的第

六十二和第六十四集团军总共只有 9 万人，1000 门大炮，120 辆坦克。德军占有相当的优势。

战斗时交战双方，都是十分艰难的。斯大林格勒的街道和广场都成了激战的战场，有些重要的据点被反复争夺。第一火车站的争夺持续了一周之久，曾 13 次易手。

德军不顾一切，一步步向市区中心逼近，但遭到苏军异常顽强的阻击。每向前推进一步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在形势最危急的时刻，朱可夫命令近卫第十三师渡过伏尔加河，进入斯大林格勒，并向德军发起了突然反击，夺回了一些重要据点。在航空兵和炮兵的协助下，斯大林格勒的局势被稳定下来。

9 月底，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被再次召回莫斯科具体讨论反攻计划。朱可夫同时建议罗科索夫斯基担任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并将其改为顿河方面军；东南方面军则改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斯大林同意了他的建议，并命令朱可夫回到前线，再详细核实反攻计划中规定的出发地域和其他具体问题。

在这一期间，战斗在日日夜夜地进行着，德军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被击退后，已经精疲力尽，不仅士兵，而且军官的士气也急剧低落了，很少有人相信，能够活着离开这个令人非常苦恼的数月交战的地狱。

从 7 月到 11 月，苏军在保卫斯大林格勒的防御战中，共消灭德军 70 万人、1000 余辆坦克、2000 余门火炮、1400 架飞机。德军已经消耗了所有预备队，在“B”集团军群的两翼上是战斗力不足的军队，其力量已开始处于劣势。

到1942年11月13日，苏德双方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基本态势已发生根本扭转。德军“B”集团军群共有80个师，3个旅，100万人，10290门火炮，675辆坦克，1216架飞机。接近斯大林格勒市区和西部外围一带的是德军主力军第六和第四集团军，在外围掩护的是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意大利第八集团军、匈牙利第二集团军以及德第二集团军。其中大多为“外国”兵团。而此时在苏军方面，斯大林格勒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共有110万人，15500门火炮，1463辆坦克，1350架飞机。另外，这时的苏军已配有最新式的T—34型坦克和1250台“喀秋莎”火箭炮。

11月13日，反攻的一切准备都已就绪，朱可夫又被召回莫斯科。斯大林这次充满信心地听完朱可夫汇报的详细情况，满意地点点头。很快，反攻计划便由斯大林签署全面批准了。

1942年11月19日7时30分，西南方面军部队以猛烈的突击在两个地段上同时突破了罗马尼亚第三集团军的防御。罗马尼亚军队经不住突击，开始狼狈后退。很快在西南方面军地段上完成了战术突破。

11月22日夜間，苏军渡过顿河，然后兵分两路，一路以坦克部队为主，向西直捣德军后方，将溃退的德军赶往西面；另一路以步兵为主，南下直取卡拉奇，并于23日晨占领了该市。

与此同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于11月20日拂晓发起反攻，突破罗马尼亚第四集团军防线后，迅速向西北推进，并于11月23日傍晚在卡拉奇和西南方面军会师。德军的22个师约30万人被合围，从而紧紧地压缩在包围圈中。

到12月初，合围圈已挤压得很紧，苏军开始肃清被围的德军集团。被围的德军第六和第四集团军极力想突破合围。12月12日，德军开始向斯大林格勒方向猛冲。12月19日，这支自称为“同死神赛跑”的援军推进离斯大林格勒仅40公里的米什科瓦河，并成功地在河对岸占领了一个桥头堡。被围德军也拼命向西南突围。

就在德军即将突破合围会合时，朱可夫命令西南方面军部队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第六集团军发起了进攻。他们一路南下，迅速迂回到整个德军“顿河”集团军群的后方。同时，另一支苏军又从德军侧面发起攻势，迫使“顿河”集团军群的左翼西退。苏联军队的强大攻势，终于使救援的德军担心也有被合围的危险。为了自身的安全，德军以北向南撤退，同时被围的德军也停止了突围。解围计划彻底失败。

为了减少无谓的牺牲和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苏军最高统帅部于1月8日向德第六集团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德军投降。通牒要求德军24小时内答复。然而希特勒驳回了德第六集团军司令的投降请求。

1月10日，在5000门大炮轰击包围圈内的德军后，苏军发动了迅猛的冲锋。德军由退却变成了逃跑，沿途丢下成千上万尸体，六天时间，德军的阵地被压缩在南北长20公里、东西宽3.5公里的地段上，被击毙、击伤和俘虏者已超过10万。

2月2日被围德军全部投降或被歼。至此经过整整200天的鏖战，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大的一次战役即告结束。斯大林格勒的会战，苏军取得了彻底胜利。德军在顿河、

伏尔加河、斯大林格勒地域共损失 150 万人，3500 多辆坦克，12000 门火炮和迫击炮，3000 多架飞机及大量兵器。斯大林格勒会战对希特勒德国的战略地位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

因为朱可夫在这次战役中的突出贡献他获得了苏沃洛夫一级勋章。1943 年 1 月 18 日，在战役即将结束时，朱可夫被晋升为苏联元帅，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荣膺这一荣誉的第一位野战指挥官。

十二、向西挺进

1943 年初，在列宁格勒到高加索广阔的战线上，苏联军队几乎同时发起了反攻。1 月 18 日，苏军在拉多加湖以南打开了一条宽 8 到 11 公里的陆地走廊，终于使列宁格勒军民可以和外界进行陆路往来，从而攻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长达 900 天的封锁，使苏军在西北方向上的战略态势大为改善。苏军的形势开始越来越好。

德军为了扼制住不断恶化的战局，不断从国内调来补充兵力，于 1943 年 3 月初从南部战线实施猛烈的反突击。于是苏德双方都向库尔斯克方向调遣兵力，准备再进行一次大规模的较量。

3 月中旬的一天，朱可夫在列宁格勒解围战役中指挥战斗。斯大林打电话让朱可夫返回莫斯科。

朱可夫第二天一大早乘车回莫斯科，由于道路遭到严重破坏，一路上的颠簸，使本就疲惫的朱可夫像散了架一样。但他还是没有稍作休息就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要求朱可夫参加一个会议。在会议上反映出，1943 年的苏德战场态势已经发生了转折。这时苏军作战部队达到 660 万人，火炮 10.5 万门，坦克 1 万多辆，作战飞机 1.03 万多架，而德军及其盟国约有 550 万人，火炮 5.4 万门，坦克 5850 辆人，作战飞机 3000 架。无论在兵力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苏军都大大超过德军。

为了夺取已经失去的战略主动权，德国统帅拟定了“堡垒”进攻计划。计划的主要意图是，在库尔斯克地区歼灭苏军主力，从而创造出一个“德国的斯大林格勒”。

为此，在4月到7月的三个月里，希特勒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南、北两侧集结了50个战斗力最强的师，总兵力达到了90万人，投入了2700辆坦克和强击火炮，同时还配备了2000多架作战飞机，几乎占德军在苏德战场上全部战斗机的69%。

朱可夫奉命来到沃罗涅日方面军。他与司令员瓦杜丁上将一起几乎走遍了方面军的所有部队。经过敌我双方的详细对比。朱可夫感到在库尔斯克举行大规模战役是完全可行的。同时，由于希特勒把原“堡垒”计划一拖再拖。从原计划的5月推迟到7月初。苏联军队已经从冬季战役的消耗中完全恢复过来，时机对德军是相当不利的。

朱可夫立即向最高统帅部建议迅速集结军队，以便阻挡德军的进攻并发动反攻。很快，仅承担苏军主要突击任务的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兵力就达到了133.6万人、3444辆坦克、19100门火炮和2900架飞机。并在库尔斯克的地区构筑了250—300公里的防御纵深。

7月4日夜间，朱可夫得到消息，当天俘虏的一名德军士兵供认了德军在7月5日拂晓转入进攻。

中央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问朱可夫：“我们怎么办？是先报告最高统帅部，还是立即下达实施反攻准备命令？”

朱可夫坚决而果断地回答：“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你按方面军和最高统帅部的计划下命令吧，我去给最高统帅打电

话。”

2点20分，苏军中央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先发制人，在德军发起进攻之前，下达了反攻准备的命令。顷刻间，重炮的轰击声，炸弹、火箭弹的爆炸声，以及飞机马达的轰鸣声汇成一片，整个库尔斯克突出部地域都震动了。

德军在5点30分发起了进攻，但由于苏军猛烈炮击使他们措手不及，进攻组织得不太好，甚至有些地段没有发起有效的进攻，说明德军已经遭受到严重打击。

战斗打得非常艰苦，德军的猛烈冲击，都阻在防御阵地前。德军虽然付出了重大伤亡，仍不能把苏军向后推动一步。

此时，朱可夫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在中央方面军地段，德军已显示出没有突破防御的力量了。为了让德军没有时间转入防御，朱可夫命令布良斯克方面军和西方面军的加强近卫第十一集团军于7月12日转入进攻。苏军很快突破了德军防御并开始向奥廖尔总方向前进。

德军在奥廖尔地域连连后退，不得不以苏军中央方面军正面的德军集团抽调部队来加强奥廖尔地域。但朱可夫抓住时机，立即让中央方面军从正面转入进攻。

战斗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苏德双方军队都决心压倒对方，争夺战场主动权。

朱可夫亲自来到沃罗涅日方面军司令部。在那里他和华西列夫斯基、瓦杜丁、科涅夫经过短暂的讨论，决定要更加有力地继续反突击。并将两个方面军的全部兵力投入决定性的反攻。

德军已开始疲惫不堪，并对胜利丧失了信心。7月16日，

德军转入防御没多久，就开始向后撤退。8月5日，苏军解放了被德军占领两年之久的奥廖尔。为了庆贺苏军的胜利，在斯大林的提议下，在首都莫斯科120门大炮齐鸣几响，这是苏联卫国战争以来第一次响起的祝捷礼炮。这时苏联统帅部懂得，苏军打赢了库尔斯克战役，它实际上就打赢了这场战争。

在这次会战的50天时间里，德军总计损失50多万人、1500辆坦克、300门火炮和3700多架飞机。与莫斯科战役和斯大林格勒战役不同的是，库尔斯克战役是一次预先计划好并得到充分保障的深远突击。而苏军参加这次战役的兵力比以往任何一次大规模反攻战役的兵力都多。为此朱可夫被授予苏沃洛夫一级勋章。

1943年8月25日，朱可夫被召回最高统帅部，讨论苏军更广阔战线上展开全面进攻的计划。

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盟军已于7月13日在意大利南部的西西里岛登陆。但总参谋部认为，英、美两国还不打算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德国又在其东线战场投入了主要兵力，他们足够的人力和物力进行积极的防御。

朱可夫提出在进攻战役上，采取分割敌军并合围敌军集团的战术。但遭到斯大林的反对。斯大林对大规模合围德军没有足够的信心。朱可夫没有去争执，他知道那样没有作用。

当天晚上朱可夫上呈了一份全面进攻计划。斯大林长时间查看了该计划所列的现有兵力兵器表，然后，和往常一样，拿起蓝铅笔把所有数字几乎削减了30—40%。

他边划边说：“剩下的，等两个方面军接近第聂伯河时，

最高统帅部再拨给。”

夺取第聂伯河，可以保障解放右岸乌克兰战役的实施。因此其战略意义对苏德双方都非常重要。为了提高强渡第聂伯河的苏军官兵士气，苏联最高统帅部发布命令，规定各级首长，对于强渡杰斯纳河的，授予苏沃夫勋章；强渡第聂伯河的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苏军在宽达 700 公里的地段上强渡第聂伯河。由于准备充分，士气高昂，部队表现出极大的一往无前的精神。一些部队甚至不等舟桥和大型渡河器材到达，就用木排、渔船、小艇等千方百计地横渡过岸。德军无法阻止蜂拥而至的渡河大军，很快德军在第聂伯河的防御被粉碎。这次渡河战役，苏军大约有 2500 名士兵、军士、军官和将军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1943 年 10 月 20 日，渡过第聂伯河的沃罗涅方面军改称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草原方面军改称乌克兰第二方面军。解放乌克兰的会战拉开了序幕。

11 月 3 日晨，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突然出敌意外地发起了对基辅的进攻。11 月 6 日就解放了乌克兰的首都。随后乌克兰的大小城市一个接一个被苏军收复。到 12 月初，苏联中部和南部的德军被击退了 200 多英里。尔后苏军建立了正面为 400 多公里、纵深为 100 公里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登陆场，为进一步实施大规模进攻奠定了基础。

为了详尽了解各方面军的情况，审查和确定进攻战役的计划，朱可夫于 12 月中旬回到莫斯科。由于近 8 个月的不停奔波，睡眠严重不足，朱可夫已感到精疲力尽了。他不得不

利用在莫斯科的几天里尽可能地休息，以恢复精神和体力。

经过几天的全面总结和对局势的分析，苏军最高统帅部决定在 1943 年冬和 1944 年展开北由列宁格勒，南到克里木的大范围进攻。斯大林充满信心地说：“现在我们更强大了，我军更有经验了。我们不仅能够，而且应该实施合围战役。”

随后，朱可夫被派往乌克兰第一和第二方面军负责协调工作。但 1944 年 2 月 29 日，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在一次视察阵地时遭到枪击。3 月 1 日，朱可夫被任命为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4 月 15 日，瓦杜丁大将牺牲了。

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在朱可夫的指挥下，于 3 月 4 日穿越几乎无法通过的田野发起了对切尔诺夫策的攻击。朱可夫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在这位威震全军的著名元帅的鼓舞下，方面军在一条约 110 英里长的正面上突破了德军的坚固防线，两天之内向前挺进了 15—30 英里。

德军统帅部为了对付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迅速抽调了 15 个师集中到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正面，经过八昼夜的较量，3 月 21 日，朱可夫粉碎了德军的抵抗，继续向南推进。3 月 24 日，占领了切尔特科夫城，3 月 29 日，解放了切尔诺夫科市。3 月底朱可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又使包括 23 个师在内的德军集团陷入合围。

朱可夫指挥大军势如破竹般向前挺进，致使苏联的新闻媒体都无法准确报道。有一次只好笼统报道说：“又解放了 240 个地方。”苏联新闻局 4 月 3 日发布的一项特别分报说：“朱可夫指挥的 28 天作战，解放了 16173 平方英里的苏联领土、3 个乌克兰区中心城市，以及 57 个城镇。”

朱可夫再次显示了高超的指挥才能，并因为他的卓越功绩，使他又荣膺第一号胜利勋章。胜利勋章是1943年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设立的，主要奖赏给“卓越的辉煌胜利”的少数出类拔萃的高低将领。而朱可夫则是获得这一荣誉勋章的第一人。

1944年4月22日，朱可夫奉命回最高统帅部，讨论夏秋季战局。傍晚，朱可夫来到斯大林办公室，许多军事领导人都已经在那里了。斯大林首先说：“6月份，盟军终于打算以大批兵力在法国登陆。我们的盟军也着急了！”斯大林禁不住笑着说：“他们生怕我们独自打败了法西斯德国，他们没份参加。当然我们所关心的是德寇终将在两个战场上作战，这会使得他们的处境更坏。德寇将无力挽回败局了。”

随后，朱可夫详细叙述了对1944年夏季战局计划的看法。朱可夫提议，把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指挥交给科涅夫，以便让他自己能回到最高统帅部着手准备解放白俄罗斯的战役。

在1944年的苏德战场上，两军力量对比又有新的变化，德军兵力不足500万人，而苏军兵力达650万，超过德军兵力30%。在武器装备方面，苏军的火炮超过德军70%，飞机超过170%。而且此时苏军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装甲部队和机械化部队，有活跃在敌占区的近百万游击队。

4月末，苏最高统帅部定下了进行夏季战役的最后决心。总参谋部制定了代号为“巴格拉季昂”的白俄罗斯战役计划。最高统帅为了实现白俄罗斯战役计划，预定实施三次强大的突击：

——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对维尔纽斯总方向实施突击；

——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对巴拉诺维奇实施突击；

——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在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的左翼集团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右翼集团的协助下，对明斯克总方向实施突击。

6月5日，朱可夫到达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指挥所，会见了司令员罗科夫斯基和军事委员布尔加宁。他就战前准备工作和方面军领导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并取得一致意见之后，他又立即来到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在那里他和司令员扎哈罗夫一道去前线观察所，亲自了解和研究德军防御前沿的情况。

朱可夫很快发现德军统帅部犯了一个和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时，苏联犯的同样的错误。德军预计苏军夏季首先攻击的地方仍是乌克兰、而不是白俄罗斯。德军统帅部认为，由于白俄罗斯的森林沼泽地形条件的限制，苏军不可能将配置在乌克兰的四个坦克集团军转调白俄罗斯，也不可能在白俄罗斯很好地利用这些坦克集团军。

朱可夫根据德军错误的判断，一方面特别谨慎小心地进行输送调动兵力；一方面抓紧时间，争取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部队所需的各类装备物资调整完毕。

6月23日，波罗的海第一方面军、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同时发起了总攻。第二天，白俄罗斯一方面军也转入了进攻。

苏军凌厉的攻势，仅用6天时间，就击毙德军10万多人，俘虏3万多人。7月3日，苏军解放了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

并把东南方向溃退下来的 10 万德军包围在明斯克以东地区。到 7 月 11 日，被围的 10 万德军被全歼，有 35000 德军官兵被俘虏。这批俘虏被押送去莫斯科示众。7 月 17 日，他们成为战争期间“进入莫斯科的第一批德国军人”。

8 月 23 日，朱可夫受斯大林之命返回莫斯科。他被派往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指导该方面军作好对保加利亚作战的准备。

苏联政府于 9 月 5 日对保加利亚宣战。但当朱可夫的部队进入保加利亚时，没遇到任何抵抗。眼前一派和平景象。当地的保加利亚居民自发地与苏联军人举行联欢。朱可夫未发一枪一弹就解放了保加利亚。

9 月底，朱可夫受命从保加利亚前往华沙地域，负责白俄罗斯第一和第二方面军的作战行动。

朱可夫了解到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由于在莫德林和华沙之间的平原地带实施进攻时，遭到了德军的顽强抵抗，伤亡很大，已经疲惫不堪了。朱可夫立即打电话请求停止无效的进攻，让部队转入防御，以使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得到休整和补充。

11 月 15 日，朱可夫被任命为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由他准备进攻华沙—柏林方向。斯大林希望由朱可夫指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去攻占柏林。此举后来引起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的不满，他认为这是斯大林有意地把夺到最后胜利的美差交给朱可夫。他对朱可夫的个人恩怨也就此形成。在朱可夫后来遭遇挫折时，科涅夫的打击报复就可以被理解了，这是后话。

1945 年 1 月 17 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与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前进到同一直线上。同时波兰第一集团军和朱可夫的部队同时进入华沙。朱可夫特意安排第一集团军首先进城，他的精明之举在后来波兰与苏联的关系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苏军在这段时间里，以迅猛的速度向前推进，平均每昼夜前进 25—30 公里，而坦克集团军则达到平均 45 公里的速度，最高时一昼夜前进了 70 公里。很快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也顺利地赶了上来，并在 3 月底前进到尼斯河，与早先到达奥得河的朱可夫部队排成一线。柏林就在眼前。

十三、进攻柏林

1945年3月29日，斯大林把朱可夫召回莫斯科。当天晚上，斯大林待国防委员会散会后，单独与朱可夫会面。他默默地和朱可夫握握手便直接说：“德国的西方战线已经彻底崩溃了，看来希特勒并不想阻止美英盟军的进攻。然而在同我们作战的各个重要方向上，他们却加强部署兵力。”斯大林指着地图，继续说：“依我看，在柏林将会有一场恶战。”

的确，正如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所说：“我们要坚守俄国的这道防线，直到英国人踢我们的屁股为止。”德军此时宁愿停止西线抵抗，为美英军队让开通往柏林的道路，也不想把柏林交到苏联人手里。许多失去了信心的德军因为害怕英勇善战的苏联军队，就主动跪到西线战场去当盟军的俘虏，德国人已开始对苏联士兵的勇敢存在恐惧感。因为在苏联犯下的罪行，他们认为苏军获胜后决不会轻饶他们。

当时在柏林地区，德军在对苏的方向上布署了90个师约100多万人、10400门火炮、1500辆坦克及3300架飞机，同时在柏林城内编有20万人的预备队。而苏军参加柏林战役的部队是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和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总兵力在250万人以上，41600门炮，6250辆坦克，7500架飞机。从兵力和武器装备上讲苏军明显占有优势。

4月1日，斯大林把朱可夫和科涅夫同时召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给他们看了一份有关美英盟军准备实施攻击柏林战役的电报。随后问道：“现在谁将要攻克柏林，是我们还是盟军？”

科涅夫抢先回答：“我保证苏军一定能先攻占柏林！”斯大林怀疑地问：“你的主力在南翼，你怎样建立一个攻占柏林的突击集团呢？而要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你将不得不大规模地变更部署。”

科涅夫着急地说：“您可放心，方面军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我们将在适当的时间内重新部署完毕，为进攻柏林作好准备。”

朱可夫忍不住说：“我们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已经为攻克柏林做好一切准备。部队齐装满员，兵力兵器都处于‘饱和状态’，已经把攻击目标指向柏林，况且我的部队距离柏林最近。”显然他们都想抢头功，谁都知道攻克柏林的巨大荣誉，柏林被攻克了，战争也就胜利了。

当斯大林决定由朱可夫首先进攻柏林之后，科涅夫心中很是不服。他决心抢在朱可夫前攻进柏林，使朱可夫在荣誉面前相形见绌。

朱可夫接受命令后，回到白俄斯方面军。柏林战役的特殊性，使他格外重视战前准备，此时朱可夫知道对德军已很难隐瞒自己进攻的意图。其中柏林的咽喉奥得河成为进攻的关键所在，一旦奥得河被突破，苏军就能立即对柏林发起直接突击。朱可夫提出：“柏林会战将决定于奥得河的战斗。”

在确定具体的攻击时间时，朱可夫一反常规，决定出其

不意地实施夜间攻击。以往朱可夫总是清晨开始实施炮火准备，天色已亮时再让步兵和坦克实施冲击。他认为德军一定摸准了这一规律，为了造成对德军进攻的突然性，只有利用德军这一习以为常的观念了。

朱可夫亲自来到进攻最前沿近卫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员崔可夫的观察所。他兴奋得通宵未眠。他不断看表，时针显得比平时慢得多，进攻确定在5时进行炮火准备。

4时57分，朱可夫走出地窖。他抬头望望黎明前大雾所笼罩的德军阵地，想到炮火很快就要打破这一战前的寂静时刻，整个战争就要结束了，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

5时，朱可夫下令战斗开始。顷刻间，数千门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炮几乎同时发射，轰炸机隆隆作响，大地震撼，火光把大地照得雪亮。德军阵地几乎没有进行任何还击。

紧接着间距为200米的140部探照灯一下子都开亮了。总共1000多亿度的电光把德军阵地照得通明，德军士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强烈光柱照得目眩眼花，心惊胆颤。苏军的坦克和步兵发起了总攻。黎明时，占领了德军的第一线阵地。

然而，苏军的强大突击被泽劳弗高地阻住了。对德国人来说，泽劳弗高地是精神上的支柱，它的后面就是柏林，它被希特勒称为“柏林之锁”和“无法攻克的堡垒”。

而此时对于朱可夫进攻中遇到的麻烦，科涅夫心中暗喜，他急忙争取斯大林的批准，以两个集团军转向对柏林的进攻。

战后，许多人认为斯大林是有意让两位杰出的军事领导人在柏林展开竞争，以期尽快攻克柏林。无论这个论点是否正确，事实上却造成了这样局面。

当朱可夫知道科涅夫在火速向柏林进发后，情绪显得特别激动，他决不能让别人轻易夺走胜利的荣誉，朱可夫争强好胜的性格充分显示出来。他立即下令，要求各坦克集团军、各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在一系列地段上全力突击。

在泽劳弗高地前，苏军的坦克滚滚而来，苏联士兵像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德军阵地发起冲锋。很快德军就经受不住如此强大的冲击，开始退却，4月18日晨这个被称为“柏林之锁”的高地终于被朱可夫的部队打开了。

1945年4月20日下午，朱可夫的第三突击集团军首先开始向柏林市区炮击。与此同时，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也于4月21日越过柏林环形公路的防线。两个庞大的方面军包围了柏林。

此时，斯大林对朱可夫和科涅夫发布了命令，给两个方面军划分了向柏林市区进攻的分界线，科涅夫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被划在国会大厦以外，而国会大厦恰恰被看成柏林的象征，希特勒就在里面。科涅夫心中大为不快，但他又无法公开表示不满。

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从4月25日转入了市内战斗。为了争取时间，朱可夫指挥部队昼夜不停地进攻。白天由第一梯队进攻。夜间则由第二梯队进攻，千方百计不让德军有机会建立新的防御支撑点。同时，在市内的巷战中，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朱可夫命令在步兵和坦克的每一次冲击前，都首先得到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11000门大炮每隔一定时间就同时开火。从4月21日到5月2日，苏军向柏林发射了180万发炮弹，相当于36000吨钢铁的重量。

4月30日，希特勒作出了一生中最后的决定：在黎明时与他的情妇爱娃·勃劳恩结婚。下午3点半他开枪自杀，他的新婚妻子服毒自尽。

就在当天，朱可夫的大炮向国会大厦开了火。为了争夺这座象征第三帝国政权的宏大建筑物，苏德双方展开了一场近距离的血战。苏军不得不一层楼一层楼地与德军搏斗，直到晚上21时50分，苏军才终于在大厦主楼的圆顶上升起了胜利的旗帜。

5月2日下午3时，由希特勒临死前任命的继承人邓尼茨宣布德军停止一切抵抗，至此柏林战役结束。在这场仅历时16个昼夜的战役中，苏德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苏军消灭德军100万人，俘虏80多万人，缴获和摧毁6000架飞机、1.2万辆坦克、2.3万门火炮。而苏军自己也伤亡了30多万人。

5月7日凌晨2点41分，新上任的德国总统邓尼茨授予德国海军总司令弗雷德堡全权在无条件投降文件上签字，但投降仪式的地点却在丹麦边境的盟军艾森豪威尔总部举行。苏军代表为伊万·苏斯洛巴罗夫将军。

斯大林对这次投降仪式十分气恼，无论是地点的选定还是签字的方式都明显地贬低了苏军而偏向盟军，严重损害了苏军的威望。当他知道苏斯洛巴罗夫代表苏联在投降文件上签了字时，气得直接打电话给炮兵参谋长沃罗诺夫：“这位‘著名的’炮兵将军伊万·苏斯洛巴罗夫究竟是谁？”他大骂沃罗诺夫教导无方。并让苏斯洛巴罗夫立即回莫斯科，接受严厉的处分。

斯大林打电话给在柏林的朱可夫，详细说明了他对受降的意见和要求。他认为是苏联人民，而不是同盟国，肩负了战争的主要重担。投降书应在法西斯侵略的中心——柏林签署，而不能在其他一个地方同盟军统帅部签署。并命令朱可夫元帅代表苏联出席投降仪式，随后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收到了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的电报。电报说：“苏联方面认为苏斯洛巴罗夫不是苏联方面的合适代表。要求签署一项更正式的投降书，仪式要在柏林举行。由朱可夫元帅代表苏联政府。

艾森豪威尔为消除不必要隔阂，立即电复安东诺夫，他乐意去柏林参加签字仪式。

1945年5月9日零点整，投降仪式在柏林的一所规模不大的工程学院的会议厅里正式举行。朱可夫担任主席的身份，由他主持了德国无条件投降仪式，随后在当天上午9点，美、英、苏三国同时向本国及全世界公布德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反希特勒同盟的胜利，苏联作出了决定性的重要贡献。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苏德战争是二战的主要战场。苏联红军共粉碎法西斯集团607个师（盟军粉碎176个师），德军在苏德战场上的全部损失为1000万人（德军在二战中总共损失1360万人）和75%的武器装备。如此辉煌的战果是红军战士和苏联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写就的。然而史无前例胜利的背后是史无前例的牺牲。在100多个硝烟弥漫的战场上，2000多万苏联红军和人民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大片的土地、农庄和城镇被毁于一旦。

为了庆祝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所取得的对德作战胜利，

1945 年 6 月 24 日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作战部队、海军部队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阅兵式。阅兵首长由副最高统帅、苏联元帅朱可夫担任。

阅兵式这一天，朱可夫早早起床，望着窗外下的毛毛细雨，心情无比紧张和激动。上午 10 点，朱可夫骑着马向红场走去。在检阅部队和向部队问好时，他看见雨水在军人的帽檐上直淌，然而谁也不曾理会，眼前出现一个个经受战火磨炼的坚毅的面孔和欢乐的眼睛。他感到苏维埃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

十四、和平时期的政治挫折

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委任朱可夫作为苏方最高长官，去柏林参加由苏、美、英、法四国接管德国的管制委员会。参加对德管制委员会的美国代表是艾森豪威尔，英国代表是蒙哥马利元帅，法国代表是塔西厄。

到达柏林后，艾森豪威尔主动拜访了朱可夫。在朱可夫的总部，两位传奇式的军事首领按照军人的方式第一次相识了。礼节过后，艾森豪威尔拉着朱可夫的手，久久地注视着这位久闻大名的苏联元帅，说道：“啊，您原来是这样的。”在柏林期间，朱可夫和艾森豪威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然而朱可夫却和蒙哥马利发生了一次有趣的小摩擦。有一次蒙哥马利对朱可夫谈起了阿拉曼战役，他认为阿拉曼战役和斯大林格勒会战具有同样的意义，也想以此来赞誉朱可夫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军事成就。但由于朱可夫的直率性格，他忍不住地向蒙哥马利陈辩道，阿拉曼战役不能与斯大林格勒会战相提并论，阿拉曼战役只是一个集团军规模的战役，粉碎的只是德国隆美尔的一个军。而参加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却有好几个方面军。这一战役是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转折的开端。朱可夫说话时没顾客人的面子，使蒙哥马利感到多少有点不舒服。

1946年4月，朱可夫被召回莫斯科负责陆军的工作。担

任陆军总司令。此时的朱可夫作为苏联卫国战争统帅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而受到斯大林的青睐，他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朱可夫的汗马功劳得到那些从战争中被解放出来的苏联人民的最充分的承认，在当时，他的名声仅次于斯大林。

朱可夫回国后，渐渐在政治斗争中显示出不适应。很显然，在政治上朱可夫远没有军事上的才能，他的倔强、豁达而又喜欢自夸的性格、大胆果断的处事作风，以及独特和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方式，使他与斯大林本人贯有的武断专横、沉醉于个人崇拜的作风难以相融。

1946年7月，《真理报》不动声色地刊登了一则消息：朱可夫被调到敖德萨军区，担任一个不重要的职位。

朱可夫仅仅担任了三个月的陆军总司令，被科涅夫顶替。朱可夫的被贬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战争结束后，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他的地位和作用绝对不能受到威胁。以专断著称的斯大林不能容忍他周围的人名望太高而喧宾夺主；第二，是朱可夫对于斯大林坚持把战争的胜利归功于他自己的天才，越来越轻蔑，以至到了十分反感的程度。在一些场合，他公开表示了这种不满情绪。而秘密警察把朱可夫的言论报告了斯大林；第三，朱可夫历来轻视党和政治工作在军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战争时期，斯大林曾对坚持搞单一首长制的朱可夫作了让步，在军队中取消了政治委员。而战争结束后，斯大林再也不能容忍朱可夫那种对党的工作人员的排斥态度。

很快，斯大林就对朱可夫摆出另一种态度，他极尽全力

贬低嘲笑这位被他当年称作“胜利象征”的副统帅。斯大林有一次甚至说：“我们曾经赞扬过朱可夫，但是他不值得赞扬。据说在每次战役开始之前，朱可夫总是做出这样的动作：他取一把泥土，嗅一嗅，然后说——我们可以开始进攻，或者相反地说——原来计划的战役不能进行。”很显然这纯属无稽之谈，但却大大损害了朱可夫的形象。

1946年朱可夫的失意并非他下坡路的终点，斯大林仍对他存有戒心，朱可夫在敖德萨军区呆了三年之后，又被调到乌拉尔军区更为低下的工作岗位。这一次则完全由于任监察部长的戈沃洛夫的报复。当年列宁格勒保卫战时，戈沃洛夫曾被朱可夫“返回”了莫斯科。对此戈沃洛夫一直怀恨在心，在对敖德萨军区视察时，他送交国防部一份对朱可夫极为不利的报告，使朱可夫再次蒙受不白之冤。

朱可夫无法忍受这样的打击和对他的诬蔑，他要求离开他终身为之服务的军队。理由有三点：一是党和政府对他在军事上的成就一笔勾销，只字不提，这是不公平的；二是他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盘查，使他失去了应有的自由，造成精神紧张；三是完全缺乏私生活。但朱可夫的要求一直没得到回音。他的私人朋友艾森豪威尔再也没收到朱可夫的信。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开始紧张起来。斯大林感到他对军事将领不公正的处置再一次损害了苏联的军事力量和国家安全，这在卫国战争前的肃反运动中已有过教训。朱可夫又开始逐渐露面，他回到了莫斯科。1950年的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朱可夫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直到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脑溢血去逝，朱可夫的变化都

不大。

就在宣布斯大林逝世的同一天，朱可夫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并同时负责苏联陆军部队。他开始被重新起用。

这一期间，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被捕，朱可夫对他早有仇恨。贝利亚想趁斯大林的去世夺取政权，赫鲁晓夫只能依靠军队。他终于在朱可夫的支持下逮捕了贝利亚，并于 1953 年 12 月 24 日处以死刑。

贝利亚事件后，朱可夫被提升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随着朱可夫在军队地位的恢复，使苏联军事机关获得巨大力量，也对稳定军心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军队中政治军官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职业的军事长官获得了全部权力。1955 年，连一级取消了政治军官的职位。取而代之的是“军事单一首长制”。在朱可夫这一坚定而又大胆的观念指导下，苏联的军事制度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军队中党的观念淡化了，政治思想束缚解除了，军官们可以提出过去禁止提出的许多问题。

1955 年 2 月，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担任国防部长。根据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朱可夫决定加速发展空军远程攻击力量和核武器力量。此时的朱可夫已经不满足于他那职业军人的角色了，他开始越来越多地以政治人物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此间，朱可夫被授予了列宁勋章和金星勋章。朱可夫成为苏联历史上获得勋章最多的英雄。

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赫鲁晓夫的权力开始逐渐增大，而此时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决定向赫鲁晓夫发起反击。当时中央主席团共有 11 名成员，而

反对赫鲁晓夫的已有 7 人。赫鲁晓夫成为少数派。

1957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一次主席团会议上，反对派突然对赫鲁晓夫的各项政策进行全面攻击。并坚决要求赫鲁晓夫辞去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投票结果是 7 比 4，多数人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此时，狡猾老练的赫鲁晓夫在得到了朱可夫等三位支持者同意后提出：“只有中央全会才有权免除党的第一书记的职务。他要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表决。他确信，只要能召开中央全会，他就能化险为夷。

朱可夫此时一直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会议一结束，他就立即命令国防部派军用飞机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火速接到莫斯科。第二天早晨，300 多名委员已经聚集到莫斯科的会议室里。反对派万万没想到朱可夫能如此神速地做到这一点。反对派大势已去，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在座位上。

赫鲁晓夫为把他的政敌清除掉，将反对派总括为“反党集团”。朱可夫也立即对“反党集团”进行批判，他认为要算清军人和“反党集团”之间的特殊宿怨，那就是其中一些人曾经参加了 30 年代后期对红军指挥人员的血腥清洗。

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朱可夫几乎把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谴责“反党集团”的活动中，但由于过于大胆的发言，触及了苏联政治的神经，开始引起赫鲁晓夫的不满。

朱可夫甚至在多次讲话中宣布：“红军将忠实地和坚定地保卫着祖国的利益，并且时刻准备来执行人民的意愿。”如果将朱可夫轻视军队政治工作的言论联系起来，不能不使党的

领袖们感到迷惘和不安，也许真的会有一天，朱可夫以执行“人民的意愿”而把他们一脚踢开。

随着权力的增大，朱可夫开始表白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作用，赫鲁晓夫也开始怀疑朱可夫是否企图树立新的个人迷信，而否定党的作用。

朱可夫又让赫鲁晓夫同意作出三大让步：一是停止苏军总政治部历来向党中央直接报告的制度，转而向朱可夫报告工作；二是军队要派代表参加秘密警察领导机关的活动，对内务部的军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边防军都要有权指挥；三是对斯大林在历史上的清洗，尤其是对高级军事将领的清洗应正式和分开地谴责。

显然有些地方，朱可夫走得太远了些，赫鲁晓夫开始对朱可夫怀有戒心，为了控制朱可夫和军队，赫鲁晓夫把朱可夫的老对头科涅夫任命为华约部队总司令，来约束朱可夫。科涅夫则与朱可夫不同，他赞扬党在军队中的决定作用，同时还极力为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制造了显赫功绩的神话，以此取悦赫鲁晓夫，并很快得到了赫鲁晓夫的信任。

1957年10月初，朱可夫在南斯拉夫访问时会面带怨气地和铁托谈论起赫鲁晓夫对军队的干预。他表示决不容许共产党恢复对秘密警察的控制。“即使赫鲁晓夫要控制也不行！”他斩钉截铁地说。这些话很快传到了赫鲁晓夫的耳朵里，终于使他下决心打击朱可夫。

赫鲁晓夫首先给铁托打电话，请他劝朱可夫不要直接回莫斯科，而是继续到阿尔巴尼亚去访问，理由是弥合一下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紧张关系。在国内赫鲁晓夫加紧准备

工作，消除朱可夫在军队中的权力。

当朱可夫回国后，赫鲁晓夫召开了一次高级司令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如何安排朱可夫的命运。赫鲁晓夫还没有足够的依据和勇气把这位功绩显赫，并一再在关键时刻帮助他的重臣拉下马。但在会上已明显表示出对这位国防部长的力量和声望的惧怕。他把朱可夫提升为部长会议副主席的岗位。谁都知道这是明升暗降，剥夺了朱可夫对军队的控制权。

朱可夫愤怒地盯着赫鲁晓夫，拒绝担任这一职务，于是开始摊牌了，辩论开始公开涉及权力问题。朱可夫简直难以相信，四个月前由他保护和支持的赫鲁晓夫转眼就翻脸不认人。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也就在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当天，塔斯社发表公报：免去朱可夫国防部长的职务。但通告发表一星期内，再没有任何有关朱可夫的消息。在此期间，朱可夫和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内展开了一场权力之争。然而朱可夫又一次在政治舞台上遭到失败。

对朱可夫的批判很快展开了，他的主要错误是：他削弱党的工作者在军队中的作用。其中的一项证据提到由他签发关于苏联陆、海军中党组织工作的训令。训令禁止在党的会议上对军事指挥员的命令提出任何批评意见。他曾经把“真正的爱国者”的含义解释为：首先是一个无私地献身于苏联人民的人，其次才是献身于共产党主义事业的人。

另一点就是朱可夫公开坚持要为被斯大林清洗的红军领袖们恢复名誉。这涉及到现任党的主要领导人的一些责任，其中也包括赫鲁晓夫本人。同时朱可夫还被指责为搞新的个人崇拜，篡改战争历史，强调个人的功劳等等。

朱可夫终于在这种有组织的、大范围的批判中心灰意冷，他的自尊心和心灵再一次受到十分沉重的打击和摧残。最后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朱可夫竟投了自己的反对票，把他从主席团清除出去。最后他被宣布退休。

此时，科涅夫开始大肆攻击朱可夫，他作了长篇的发言，从各个方面否定朱可夫，他不惜捏造事实来抵毁朱可夫，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当朱可夫下台后，国防部长的位子却并没落到他的头上，正是他在清算朱可夫时所表现出的野心和妒忌心，让赫鲁晓夫看轻了他，而让十分驯良、毫无特色的马林诺夫斯基担任国防部长。

朱可夫被罢免之后，红军中展开了清除朱可夫影响的运动。红军总政治进行了大改组。党对军队的领导和政治教育得到重视和加强。政治军官获得了一些特权，他们的威信有了提高。

1961年夏天，柏林地区东西方向的危机达到了高潮。为了缓解紧张的局势，赫鲁晓夫想到了朱可夫，他想暗助于朱可夫的声望，于是要求朱可夫重返部队工作。但赫鲁晓夫却只是显示一种宣传姿态，因为对朱可夫的攻击并没有停止，朱可夫断然地拒绝了，他对赫鲁晓夫彻底失去了信心。

1962年末到1963年初，原被赫鲁晓夫认为驯良的马林诺夫斯基在权力圈内站稳了脚跟以后，开始与赫鲁晓夫分庭抗礼。他要求大量增加军费预算，这与赫鲁晓夫对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政策相抵触，但马林诺夫斯基得到了中央主席团大多数的支持。赫鲁晓夫不得不再次请求朱可夫的帮助，并以恢复名誉作为报答。但朱可夫厌倦了政治斗争，再次拒绝卷

入这场争端。但赫鲁晓夫还是想法把他搬出来。1963年5月苏联外交部在赫鲁晓夫的指示下请美国驻苏大使馆邀请朱可夫参加武装部队的酒会。但朱可夫没有露面。

朱可夫的再次下台，使他作为一个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在历史中消失。这对他个人的损失虽然很大，但对苏联政治和军事的影响难以估计。苏联的战争史只得又一次重新编纂和改写。那些政客和史学家不得不巧妙地遮住朱可夫的光辉，把他的形象从人们心目中抹掉。在有些地点则不得不用“西方方面军司令员”等含糊的词替代朱可夫。但是历史毕竟是人民创造的，苏联人民是忘不掉自己的英雄。

1964年，由于政治上的挫折，在朱可夫68岁的时候与他的妻子离了婚。随后没多久又和比他年轻25岁的格林娜结了婚。她是朱可夫在一次外出途中偶然认识的，他们相处的很好，彼此十分投机。婚后，格林娜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名叫玛莎。此时，朱可夫那颗早已灰冷的心似乎又从格林娜和小女儿那里得到了新的温暖和慰藉。

1964年10月13日，赫鲁晓夫从他的海边别墅被召回莫斯科，在此之前他正在格鲁吉亚的黑海海边度假。当他发现回来参加的这个紧急主席团会议实际上是对他的审讯时，赫鲁晓夫慌了手脚，这一次与1957年不同，他的身边没有朱可夫的保护和支持。赫鲁晓夫再次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以期有所转机。但全会如期召开后，投票的结果仍是赫鲁晓夫失利。

10月18日，赫鲁晓夫被解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苏联联部长会议主席等职务。同时选举勃列日涅夫担任党的第一书记。

赫鲁晓夫的下台,为恢复朱可夫的名誉扫清了障碍。1965年4月,在苏联人准备庆祝战胜德国20周年前夕,朱可夫的名字开始在苏联的出版物上出现。在莫斯科举行庆祝活动的几天前,苏联新闻社发行了朱可夫的一张胸前挂满勋章的照片,罗科索夫斯基等一些二战的老战友在写回忆文章时,又重提朱可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

1965年5月8日,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大会厅向6000听众发表演说,当他念到战争中著名的军事指挥员名单时,听众对朱可夫的名字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第二天,莫斯科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检阅。这时人们看到了多年不见的朱可夫、布琼尼、伏罗希洛夫、铁木辛哥等几位元帅站在列宁墓顶上。朱可夫终于回到了人民的生活中。当他穿着制服走在莫斯科大街上时,许多人向他问候,许多妇女甚至激动地流下了眼泪。这一天晚上,在一个招待会上,苏联军官争先恐后地与他握手致意。

1966年12月,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朱可夫国家的最高级勋章——列宁勋章,以表彰他对军队的贡献,以及庆祝他的70岁生日。

1969年8月14日在哈勒欣河击败日本30周年纪念时,蒙古人民革命党第一书记及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授予朱可夫蒙古人民共和国英雄星勋章。

就连赫鲁晓夫,也在1970年病中时,对朱可夫作了这样的赞扬:“我对他作为一个军人的评价还是很高的。现在我对他的高度评价丝毫也没减少。”

朱可夫于1974年6月病逝,终年78岁。

朱可夫作为杰出的军事领导人由于偏袒军事干部而轻视政工干部，许多人给他戴上了依靠“拿破仑主义”统率和鼓舞士兵的帽子，但他的的确确是控制军队的出色天才。战争期间，朱可夫在军队中赢得了空前的声望。曾有人这么说过：“如果有一个能控制军队的话，那就是朱可夫。”对于这一点，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是知道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朱可夫在政治上屡遭挫折。他既是一个无尚荣耀的元帅，又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

朱可夫的一生，基本是作为一个军人度过的，正如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所说：“朱可夫具有卓越的统帅天赋。他生来就是从事军事活动的，就是从事军事战略活动的。在战胜法西斯德国和军队享有荣誉的苏联统帅中，朱可夫是最杰出的。”

艾森豪威尔这样评价朱可夫：“有一天肯定会有另一种苏联勋章。那将是朱可夫勋章，这一勋章将被每一个赞赏军人的勇敢、眼光、坚韧和决心的人所珍视。”